

台州史志

2022年第2期

(总第94期)

《台州史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吴国超

副主任:林明达 许宏志 刘东生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康 王有浙 方先勇 冯建胜

阮士标 陈长有 陈成叶 陈青鸿

陈献之 罗海军 俞超 袁义忠

蔡如松

主办单位:

中共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台州市地方志编纂室)

台州市党史学会

主编:刘东生

副主编:郑秉成 陶毓

编辑:王赞赞

地址:台州市行政大楼1604室

电话:0576-88510609

邮编:318000

E-mail:tzds@zjds.org.cn

出版时间:2022年6月

印刷:台州市机关印刷有限公司

目录

卷首语

- 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3

史志故事

- 头门岛上显神威 杨齐通 4
粟裕、刘英和红军挺进师战斗在台州的故事 李兆建 14
长空下的记忆 王俏允 24

人文台州

- 满堂红妆十里长 胡建新 27
黄岩历代书院考 王 康 31
赵孟頫入天台史考 许志刚 34

史志论坛

- 让地方党史成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教材 李幸斐 42
论徐霞客、王士性对水资源的勘察与保护 丁式贤 47
论王棻的修志思想 沈松平 包宛灵 54

简讯

- 台州召开全市党史三卷编写工作推进会暨业务培训会 62
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促进会到台州调研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开发工作 63
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
——温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题展荣获浙江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特别奖 64
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推动党史数字化改革工作 64

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积极投身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为人民战斗、为祖国献身、为幸福生活奋斗，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实践充分证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今天，我们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拥有更优越的发展环境、更广阔的成长空间，迎来实现抱负、施展才华的难得机遇，广大青年要牢记党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追求进步，是青年最

宝贵的特质，也是党和人民最殷切的希望。”新的伟大征程上，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进。要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新时代的广大共青团员，要做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模范，做刻苦学习、锐意创新的模范，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模范，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模范，做崇德向善、严守纪律的模范，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喊出响亮的青春誓言，这是新时代中国青少年应该有的样子。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永不停滞的前进姿态，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先锋，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用青春和汗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节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头门岛上显神威

杨 齐 通

我国大陆解放后，国民党残余部队纷纷撤逃，一部分退踞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同大陆人民解放军形成隔海对峙的状态。虽其兵力有限，但其千方百计，企图以大陈岛为核心，以一江山岛、头门岛、披山等岛屿为外围构筑防御体系。台湾当局把这些岛屿作为反共前哨阵地，妄图实现反攻大陆。因为一江山岛地势险要，是战略要地，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说：“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大陈是台湾屏障，一江不保，大陈难守，大陈不保，台湾垂危！”国民党军队经常地在其海、空军配合下，对浙江沿海，特别是台州沿海地区派遣飞机、军舰及特务进行破坏和骚扰，他们还经常地寻找机会“抢了就走，劫了就跑”。为了打击蒋军的嚣张气焰，为了保障沿海人民生命财产，为了祖国的统一、领土的完整。1954年5月15日，人民

解放军渡海登陆作战，先攻占大陈列岛的外围东矾列岛的头门、田岙、蒋儿岙等岛屿，拉开了解放大陈列岛的序幕，这也是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尝试，而头门岛又为解放一江山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夺取三岛，拔除了敌人前哨耳目，我军掌握了头门、田岙、蒋儿岙以北至石浦间的制海权。“清理了门户”扫清外围，为解放一江山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解放一江山岛决战前夕

根据浙东前指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60师于1954年8月30日上报作战预案，确定178团、180团（二营）担负一江山岛登陆作战任务。师炮兵团于8月下旬，赴头门岛勘察发射阵地。师炮兵群的编成：20军3

个师属122榴弹炮营，炮兵第340团、339团野炮营，338团120迫击炮1个连，12军315团榴弹炮营，海军130海岸炮，60师炮兵第340团司令部为炮兵群司令部。各营、连13个观察所相继开设，进行实地战斗准备。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经过135个日日夜夜侦察，基本上查清了一江山岛地域敌人的大小工事和火力点。侦察兵们在地图上将其一一编上号，测量并计算出炮位阵地至每一个目标之间的方向、距离和射程。解放军第20军60师副师长张锡祚指着图说：“据我看，由于图上那么多记录，敌人目标标志的蓝图蓝点，还不如说它是一张判定敌人死刑的判决书。”

二、“用炮弹热烈欢迎他们”

在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司令员的授意下，登陆指挥所指战员们日夜不停地盯住海面和大陈岛、一江山岛两岛敌情。

1954年11月1日，登陆指挥所获得情报：美国顾问团在当天下午5时，要到一江山岛203高地察看地形。

我军登陆指挥所黄朝天司令员双手叉腰，十分兴奋，当即命令海岸炮兵部队：“用炮弹热烈欢迎他们！”

下午5时整，侦察员报告：“美国

顾问团上来了，他们腋下还夹着大皮包，后面跟着好大的一群国民党军官呢！”

“好，给他点颜色看看！”黄朝天司令员把帽子摔到桌子上，命令：“开炮！”

霎时间，只见一江山岛上的203高地、乐清礁、黄岩礁、海门礁、北山湾立即掀起无数烟柱，我炮兵阵地左右两侧各炮齐鸣，阵地上响彻一阵阵山崩地裂的吼声。

从望远镜里看到一江山岛硝烟弥漫，惊慌失措的敌人怎么也想不到，炮弹会在他们头顶上爆炸，美国顾问团还未来得及看清地形，就被我军炮火给轰到防空洞里去了。

据侦察员报告：一江山岛203高地敌人观察所被打中了！岛上的通信枢纽被打中了！山脚下的炮阵地也被打中了！黄朝天司令员命令：暂停射击。

十几分钟后，岛上就有几十名国民党士兵窜了出来，跑到仓库救火，他们嘶喊着，拥撞着，从里面抢着东西。

黄朝天司令员说：“机会来了，再给他一家伙！”话音刚落，我炮阵地上又是红光一闪一闪，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203高地右边的仓库。观察员看见，那几十名国民党士兵，已不见踪影。

突然，大陈岛方向的海面上火光一闪一闪，炮弹一发发朝我方阵地射来，敌炮舰来增援了。

黄朝天司令员命令：“对准它，射击！”敌舰射过来的炮弹爆炸声完全淹没在我军炮弹强烈的轰鸣之中，我炮手推弹上膛，对准敌舰，一阵猛射，敌炮舰见势不妙，狼狈而逃。

黄司令员，战报来了！一位参谋兴冲冲地跑进指挥所。

这是一份侦察哨所获得的一江山岛敌司令官发给台湾蒋军总部的报告：“11月1日，一江山岛国军被打死打伤60余人，打毁机枪两挺，其他正在清查中。”

登陆指挥所黄朝天司令员马上将这些喜讯报告了浙东前指张爱萍司令员。张司令员说：“打得好！打得好！我感谢你们！”

海岸炮兵初战告捷，更是信心倍增。

黄朝天司令员指示炮兵部队为了达到疲劳和麻痹敌人的目的，要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展开拉锯战，炮兵指战员们只要一发现新目标，立即就开炮，白天打，黄昏打，拂晓打，深夜也突然爬起来打，直打得敌人白天晚上不敢露头。

炮兵的有力打击，极大地配合我空军的实战力量，也削弱了敌舰对我

空军轰炸机的直接威胁，使敌炮舰、炮兵在气氛紧张的对峙中一直处于被动境地，逐步陷入了瘫痪状态。

三、千军万马齐奔腾

仅仅在半年前，头门岛还是一个刚从国民党军队手里夺回来的荒凉小岛，如今竟变成了一个喧嚣的“不夜城”！为此，60师180团守岛部队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们修筑了3公里多的公路，400多米长的交通壕，5个炮兵营阵地和400多个掩体，及浙东前线指挥部等工事。

浙东前线指挥部设在头门岛山腰南侧。顺着一条交通沟走去，只见两边的土壁光洁如镜，一个个半覆盖式的掩蔽部，在沟两侧一一排列着。走进掩蔽部，满眼是电话机、军用地图和各种作战指挥用具；几十部报话机已经打开了机盖，展现出蜻蜓般的天线；马灯和蜡烛发出昏黄的光；穿着各式军服的三军参谋人员忙忙碌碌，气氛显得热烈而又紧张。大家都等待着张爱萍司令员一声令下。

1955年1月17日，当中央军委复电张爱萍司令员，批准同意于18日向一江山岛发起登陆作战时，浙东前指遂即下令：各登陆输送大队于18日拂晓前，由石浦港抵达进攻出发地域集

结，头门岛、田岙、蒋儿岙锚地。第六舰队护卫舰编队由定海港启航南下。

于是，在17日夜间至18日凌晨，我参战舰艇分别从定海港、石浦港、檀头山锚地起航，向头门岛开进。

这时，浙东沿海大陈列岛战役的首战一江山岛登陆作战的帷幕正式拉开了。参战部队的无线电还在保持着绝对的静默之中。东矾列岛以北，石浦、檀头山海域以南，一个个航标灯开始闪光，以保证南下作战的100余艘舰艇安全地抵达头门岛锚地，红色、白色的航标灯在闪闪发光，它为我海军舰艇编队引导航向，标定准确的舰位……

从石浦到头门岛夜航中，海上风浪较大，登陆艇耐波性能较差，战士有的呕吐严重，有的吐出黄水，有的甚至于吐血水；4个步兵营指战员于1月16日夜从穿山港上船，乘登陆舰航行了16个小时，17日夜又乘25吨(L.C.M)登陆艇航行了8~10个小时，至18日拂晓前抵达头门岛锚地。当时，因风浪大，无法靠岸，只好在港内分散锚泊。

头门岛的岸滩上，竖立了红色、黄色、蓝色联络灯，给各登陆艇队指定锚泊位置，这样可以避免出现港内登陆艇相互碰撞和拥挤的局面。

18日10时30分登陆部队补充弹

药完毕，11时作好出击准备，指战员虽然连日晕船呕吐，睡眠不足，但个个精神抖擞。

1月17日夜至18日拂晓，“千军万马齐奔腾！”100余艘舰艇在向战区开进。海军、空军担任战区掩护的部队，警惕地进行海上、空中巡逻掩护，组成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严密警戒幕。

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邵震、政治部主任韩玉樽率领护卫舰全体成员、纪参谋长和作战处参谋人员，均各就各位。空指于18日凌晨下令：“以歼击航空兵第29师86团夜航战斗机2架，于4时11分飞临头门岛至海门一线空域巡逻警戒，掩护陆、海军集结安全。”

7时36分，又以歼击航空兵第12师、第3师、海航第2师、第4师出动四个大队歼击机，控制战区制空权，保障战区的空中安全。

我军参战部队万余人，坚决执行命令，雷厉风行，在两昼夜内顺利地完成了战役展开，这是非常复杂的军事行动，没有严密的计划和周密的组织指挥是不可能的。至此，我军已取得了战役的主动权，战区制空权、制海权牢牢地控制在我军手中。张爱萍司令员稳操胜券，部队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发起攻击了。不仅如此，我军还

准确地掌握了战区有利我三军联合作战的“天时、地利”等条件。

四、头门岛上显神威

张爱萍司令员到达头门岛已是1月18日凌晨3时。

黄朝天汇报说，海上风很大，部队连续乘船十余小时，体力消耗大，呕吐的人多，有的呕吐、吐黄水，有的连血水都吐出来了，战士们胃口不好，尽管黄岩人民送来许多上好的蜜橘，不少人还是吃不进饭去。

“那怎么能坚持战斗呢？”张爱萍司令员眉宇紧蹙，万分焦急。他对王坤说：“你亲自去告诉部队，要他们马上想办法熬点稀粥，让大家喝点热的，解解乏，暖暖身子，要就吃饼干，要动员大家吃！一定要吃！”“是！”王坤答应着。

司令员的爱兵之情，使王坤深受感动，他总是把战士的冷暖时刻挂在心头啊！王坤想着这些，急步走了出去。

黄朝天汇报了部队在行动中有关情况，张爱萍听了非常高兴。

张爱萍来到炮兵阵地，只见一门门海岸炮、榴弹炮、野炮已经脱去了炮衣，高昂着颈子，炮兵战士们早已在阵地上忙碌开了。他们正在紧张地

擦拭炮筒，搬运炮弹。

炮群负责人向张爱萍报告了战斗准备情况，因为要准备的弹药基数多，战士们都早早地起了床，将炮弹一箱箱搬入阵地，擦去每颗炮弹上涂的重油。并说：“一个120迫击炮连，已按计划，于今日零时，秘密运送到距一江山仅三千米的大茶花礁占领了发射阵地。”

张爱萍点头表示满意。是呀，前线参战炮兵，有着明确的联合作战观念，有主动性，为了弥补我海军舰艇和海上支援炮火的不足，他们开动脑筋，反复试验，不怕失败，终于创造出将陆炮装在机帆船上的土炮艇，这20艘炮艇大大增强了海上支援炮火的密度。现在，他们又机智地将炮运到了敌人的鼻子底下，这是需要有冒险精神和牺牲精神的。

“好啊！”张爱萍赞许说：“你们为战役的胜利动了不少脑筋，你们的态度很对，在联合作战中，每个军兵种都应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都要有为登陆兵的胜利不惜牺牲自己的决心，只要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战役的胜利！”

天已大亮，离开战役发起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了，张爱萍从容不迫地工作着，他亲自带着即将出征的营以上陆海军干部，走上头门山巅。

倚石而坐的前线司令员，指点着对面的一江山和岩石上的军用地图，向干部们介绍了敌情的最新变化，下达了最后的作战指示，并向围坐在他周围的人，一一考问各自负责突破的登陆地点的实地位置，直至得到满意的回答。

“好，大家都明确了自己的作战任务，希望大家精心组织指挥，英勇战斗，我预祝同志们取得胜利。”张爱萍用充满胜利信心的目光扫视着大家，又抬手看着手表：“现在对表，”这时，时针正好指在6时30分上。

经过检查，战役的一切准备工作做到了尽可能的周密与完备，这是在前线总指挥定下最后决心后的很短时间内完成的，这样的速度对如此复杂的战役准备来说，确实是十分惊人的，虽然两天来，张爱萍几乎没有好好休息，从昨日到现在他还不曾合眼，但看上去他的精神仍然十分饱满，值得宽慰的是部队的战斗意志高涨，战役准备也令人满意，如果天公作美，那就胜利在望了。是否如徐杰所预报，是个好天气。想到这里，张爱萍不觉向海天接壤的东方望去，只见头门山港湾内，一艘艘排列有序的蓝灰色登陆艇上红旗招展，红蓝相映，艳丽壮观。码头上那块写着“同志们，为祖国立功的时候到了”的大幅标语，这

给广大指战员极大的鼓舞。

久久悬在张爱萍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今日天气很好，海上风平浪静，这对保证我军首次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胜利，实在是太重要了！此时张爱萍的心情，也同天气一样豁然开朗。

“真是天助我也！”伫立一旁的王坤，也庆幸着这好天气。

在头门山南侧的高地上，有一个水泥结构的掩蔽部。这里，人们为总指挥准备了一架高倍的巨型望远镜。从这架望远镜看出去，一江山岛及其周围海域，便清晰可见。

早餐后，张爱萍走进掩蔽部，站在巨型望远镜前望起来。

一江山岛突然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起伏的山脊，伸向海面的山岬，岛上密集的战壕、地堡，直至支撑铁丝网的木桩和敌人的活动，都可以看出来。隐现在一江山背后的大陈岛显得很高大，并肩而立的南北一江山，确如两扇大门，紧紧屏卫着大陈，一江山位置的险要一望而知，难怪美军和台湾当局对此岛如此重视。然而，我军要从这里登堂入室，进而端走他们的老巢。看来，以一江山为战役突破口进而攻占大陈本岛的作战方案，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一江山的地形之险峻，工事之复

杂，火力配置之密集，也引起了张爱萍久久的注视与思索，一江山环岛防御的工事结构，在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尽管敌人进行了严密伪装，但却逃不过身经百战的将军的眼睛，据可靠情报，守敌每人有两至三种武器，平均每百米正面即有火炮两门，机枪两挺，可以用正面、抵近，交叉射击组成浓密火网。加之守敌政治上的顽固，其战斗力超过国民党一般部队。看来，把一江山岛说成是“击不沉的美造战舰”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说：“王德同志，请你再检查一遍各部队进入战位的情况。”“是。”

王德参谋长报告说，海军第6舰队四艘护卫舰，战舰大队两艘炮舰，火箭炮船大队，以及鱼雷快艇大队，均已到达指定位置。嘉兴、大场、笕桥、宁波、栎社机场的航空兵，也均已进入待飞出动状态。各炮兵阵地，均已完成一切战斗准备。

“还有再检查一下第二梯队和预备队兵力的情况，要求他们随时作好投入战斗的准备。”王德回答。“好的。”

这时，一群记者围了上来。他们有的从首都来，有的从上海、南京、杭州来。时针正向8时走去，张爱萍悄然地对在场的记者们道：“锣鼓马上就要开场了！”

黄朝天同王坤，都是一手看着表，

一手拿着作战计划表，他们不时回头望望张爱萍，等待着司令员的命令。

指挥部里，人们的心都紧张地等待着。一个庄严的时刻，张爱萍再次举起望远镜，向周围海域逡巡了一遍。问道：“天气情况有变化没有？”黄朝天回答：“据气象部门最新报告，晴好天将持续到明天下午”。“敌情有变化吗？”张爱萍又问王德。“没有变化”。“好。”张爱萍抬手看表。时针正好指在8点正上，便平静而又庄重地宣布：“现在战斗开始！”

张爱萍威严地向守候在电话机、报话机旁的参谋们扫了一眼，接着大声说道：“命令航空兵对一江山实施火力准备！”

这时，指挥部内沸腾了，人们以最快的速度与最高的效率处理着一切，嘀铃铃，电话铃声响成了串。静默多时的无线电员们头戴耳机，手执话筒，也热切地期待着投入紧张的工作。“轰炸机群炸中了三、四号目标！”“强击机准确地对160、180、190、203高地之敌，实施了俯冲扫射！”

张爱萍兴奋地对女播音员说。“小鬼！快把这些消息广播出去，让前线所有参战者都知道！”

安装在头门山上的巨型喇叭里，立即响起了女播音员清脆响亮的声音。

胜利的捷报在山海间回荡，通过

条条银线传向空军机场、海军港湾、炮兵阵地，传到了整装待发的登陆输送队。指战员们都兴奋得跳了起来。港湾里，艇船上，立即响起了口号声。“向空军老大哥学习！”“我们保证攻克一江山岛！”然而张爱萍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他打电话给在宁波指挥空军作战的聂凤智。“聂凤智同志吗？大陈、台湾有什么反映？战区海域空域的情况有什么变化？”

聂凤智兴奋地回答。“司令员同志，情况很好，未发现敌机敌舰进入我战区。”

张爱萍叮嘱着：“一定要严密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回头对王德道：“看来，国民党部队还没有发现我军的进攻意图。”

9时正，黄朝天命令炮群实施炮火试射，在12时15分至13时22分，黄朝天命令：登陆输送大队起航。各登陆输送大队按计划分别由头门、田岙启航，编队航渡（双纵队形）向一江山岛开进，整齐的队形好像海上大检阅，十分壮观。

我登陆部队正以崭新的装备，威武的战姿，直通敌岛！这幅无比壮观的战斗画卷，连戎马半生的沙场老将张爱萍也从未见过，一切又是如此的肃穆平静，井然有序；一切都按作战计

划进行着。他激动地叹道：“这哪象在海上进军，简直像在西湖里竞渡，多么壮观呀！”

中午12时20分，三颗红色信号弹飞上天空。顷刻间，我海岸炮兵及各炮齐鸣，炮声隆隆，火光闪闪，一发发炮弹掠过海面，以排山倒海之势，打得一江山岛天崩地裂，浓烟滚滚，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使敌人通讯中断，指挥失灵，乱成一团，无法联络指挥。

头门岛海岸炮兵等持续炮击2小时零7分钟，将1.2万发炮弹，准确地射向一江山岛，给敌人进行了毁灭性轰击。

14时，在发起登陆之前，第二次火力准备开始了。10门“喀秋莎”火箭炮在船上一字排开，对北一江山岛敌人阵地进行第二次齐放，火箭弹拖着长长的火舌铺天盖地的落到了敌人190和203高地上，高地上烟火滚滚……这排山倒海的气势，犹如战鼓齐擂，激励着前线官兵们的心。

在飞机和大炮火力的突击掩护下，载着5000多名陆军部队的100多艘登陆艇和作战舰艇排着严整的防空队形，迅速分路冲向一江山岛。

在炮兵阵地上，炮兵参谋长报告：“步兵已准备登陆。”“作好射击准备！”指挥员下了命令，“离敌前沿还有800

米，还有500米，还有400米……”
“放！”指挥员下达了命令。

只见一串串炮弹飞了出去，指挥部里人们的心也随着炮弹飞了出去，从望远镜里眼看着我军的登陆艇已经靠了岸，大家都为我军步兵的安全捏着一把汗。

这时侦察兵喊了起来：“命中目标！”只见乐清礁上冒出了一股浓烟，接着传来了隆隆的爆炸声……

下午2时29分，178团5连接预定目标，在乐清礁顺利登陆，指导员洪阿毛高呼：同志们，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冲啊！

在这同时，几发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登陆成功了！登陆成功了！”指挥部里一片欢呼声，张爱萍司令员高兴地给炮兵指挥所打电话：“炮兵打得好！”

张爱萍司令员在头门岛指挥部，镇静自若，从望远镜里望出去，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江山岛和周围海域的全景，张爱萍司令员关注着敌我战斗情况的变化，部队每个战斗行动，都紧紧地牵动着他的心，他沉着有序地指挥着陆海空三军作战。当一江山岛203高地插上红旗，刚刚映入张爱萍的眼帘时，他的一颗早已飞向一江山岛的心，便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对王德参谋长说：“走，上一江山岛！”王德为

难了。岛上的战斗仍在继续，有的地段还进行得相当激烈，还时有伤亡数字报来，身居战役总指挥要职的司令员，怎能现在就上去呢？

王德劝阻说：“司令员同志，你要指挥三军，您不能离开，再说现在岛上很不安全，您不能去，我有责任劝阻您，要去也得过一阵子再说。”

然而，张爱萍却坚持要去，“现在去！”他一挥手，“马上就出发。”

16时许，一艘炮艇，终于载着前线司令员张爱萍和王德参谋长等人，飞一般向硝烟、弹光和爆炸声笼罩的一江山岛，疾驶。

当炮艇已到达一江山岛的乐清礁旁。王德说：“这就是主攻连的登陆点。”

张爱萍兴致勃勃地道，“好，就顺主攻连的路线上。”张爱萍熟练地攀登着千奇百怪、锐利坚硬的石崖。这里真陡！简直是直上直下。爬到山顶，大海还在脚下，地形之险峻，登岛之艰难，大出张爱萍的意料之外。难怪人们说一江山岛易守难攻。我们的战士，携带着如此沉重的东西，一路又要对付那么些敌人，究竟是怎么打上来的呢？张爱萍不觉叹道：

“我们的战士真了不起呀！简直是神兵天将啊！”

张爱萍踩着弹痕累累的土地，巡

视了一个又一个阵地。经历了一场激战战士们，不顾疲惫，正在紧张地修补工事，以防敌人反扑。

张爱萍一路走，一路慰勉战士们，向他们祝贺胜利：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打得好，为人民又立了一大功！”“首长辛苦！”战士们报以亲切的回答。

遍地狼藉、一片焦土的一江山岛，仍依稀可见蒋军精心设置的防御体系。水下障碍物，环岛堑壕，铁丝网，矮墙，雷区，地堡和暗堡群，炮兵和机枪阵地，一层扣一层，一环套一环，严密而又巧妙。

一江山岛经过3个小时激战，于下午5时30分战斗基本结束，但零星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2时胜利结束。敌军司令员王生明已被我军击毙，第四突击大队大队长王辅弼被我军178团6连班长傅德昌活捉。全歼敌人1086人，其中击毙519人、俘虏567人。

我军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伤亡共1417人（其中阵亡393人，伤1024人）。

五、头门岛在解放一江山岛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头门岛是解放一江山岛浙东

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当年张爱萍司令员在此指挥我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兵种渡海登陆作战，一举解放一江山岛。

二、头门岛是陆、海军出征前进攻击出发基地。

三、头门岛是我军炮兵炮击一江山岛发射阵地。

四、头门岛是解放一江山岛后勤保障物资集结补给基地。

一江山岛战役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震撼了世界，它彻底粉碎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它彻底摧毁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黄粱美梦，迫使美蒋撤退大陈等岛屿。从此，浙江沿海敌占岛屿全部解放了。

这一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我军小米加步枪的历史结束，也表明美蒋在我领海、领空称王称霸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一江山岛战役，迄今为止，是我军建军史上唯一的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战役。具有划时代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其意义十分深远。

毛主席给予很高评价，“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打得很好，我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是成功的。”

粟裕、刘英和红军挺进师 战斗在台州的故事

李兆建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领中，粟裕位列十大将之首。粟裕的人生富有传奇色彩。他从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队伍，没有上过军校，却在战争中磨练出神奇的军事指挥本领。他一生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百战成将，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位优秀的高级将领，创造了许多在军事史上堪称经典的战例。毛泽东称赞他是“最会带兵打仗的人”。

刘英 1905 年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1929 年 4 月参加红军时，就立下了“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的铮铮誓言。1934 年 7 月，刘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1935 年任红军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边省委书记。1938 年任浙江省委书记。1942 年 5

月，刘英被敌人枪杀在浙江永康方岩。毛泽东主席在刘英牺牲后曾深情地说：“刘英为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他。”

1935 年至 1937 年间，粟裕和刘英一起率领红军挺进师一千多名战士，转战于浙江西南部山区和浙南地区，与几十万的敌人“清剿”部队周旋于莽莽大山之中，创建了浙西南根据地和浙南根据地。

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四进仙居，三过天台，横穿临海，进袭黄岩，转战台州，在台州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粟裕和红军挺进师在浙南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了许多传奇的故事。

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赣

1934年6月，第五次反“围剿”已苦苦作战近一年，中央苏区的形势严重恶化。为了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央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朝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出动。7月初，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的红七军团踏上了战斗征程。

1934年7月7日晚，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县出发，经过福建长汀县、连城县、永安县(今永安市)境，攻克了大田县城，然后经尤溪县以东，进至闽中。7月底，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占领古田县黄田。红七军团进占黄田后，遵照原定计划，应该经浙江庆元县、遂昌县北上，直趋皖南。当红七军团先头部队刚到达古田县谷口时，7月30日，博古、李德突然电令红七军团转兵东进，相机袭取福州。

红七军团突然之间剑指福州，令蒋介石震惊。蒋介石急忙电令国民党各路兵马驰援。国民党“围剿”部队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连忙赶到福州督战。福州是福建省省会，城墙高大，工事坚固，敌军防守力量强大，武器精良。红七军团只有六千余人，三千余枝枪，又无攻城器材，此仗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七军团于8月7日深

夜发起攻城，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下午。敌人据险而守，并出动飞机进行轮番轰炸、扫射。红七军团根本无法继续战斗下去，只能虚晃一枪，快速脱离战区。8月中旬，红七军团进入闽东游击区，与当地的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得到了短暂休整。

8月28日，红七军团向浙江庆元县城挺进。国民党庆元县县长张致远闻讯，急忙派保安队防守县城附近的周墩。粟裕经过侦察分析，以一个连的兵力猛攻敌人碉堡，守敌四散溃逃，红七军团顺利进入庆元县城。这时，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自知浙西南兵力单薄，请求蒋介石将驻守福建浦城县的浙江省保安第三团调回庆元县，与浙江省丽水县(今丽水市)保安警察大队、庆元县保安团会合，企图夺回庆元县城。当天下午，红七军团主力在庆元县竹口镇北面的瓦窑山与浙江保安三团这三股敌人相遇。经过激战，红七军团打垮了敌人的阻截，歼灭浙江保安三团大部。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于9月4日报道了这次战斗情况。

9月10日，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北上抗日先遣队继续执行北上任务。于是，红七军团北上向浙江省江山县二十八都镇行进，占领了江山县(今江山市)清湖镇，消灭浙江保安团一

个营，并袭破常山县城，直逼遂安县城。9月17日，红七军团进军至浙江常山县芳村一带。这时，国民党军调兵遣将，企图将红七军团围歼在浙西地区。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浙江省保安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加紧追击，并将王耀武的国民党补充第一旅、第七师第二十旅从江西省调到浙江省参战。

1934年10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10月15日、21日，博古、李德两次致电指令，要求红七军团转移到闽浙赣苏区休整。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等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10月下旬，红七军团进至闽浙赣苏区，在赣东北德兴县(今德兴市)重溪地区同红十军会合，受到了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和苏区人民的亲切慰问。

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寻淮洲任师长；红十军主力改编为第二十师，刘畴西兼师长，乐少华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还决定，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

敏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刘英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稍后，以原红十军一部和当地地方武装组建为第二十一师，胡天桃任师长。红十军团成立后，继续担负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1934年11月18日，中央军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等五人组织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随红十军团行动。调粟裕任红十军团参谋长，刘英任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

11月18日，红十军团第十九师从江西德兴县出发，向浙皖赣边进发。第十九师突然向浙西出动，令国民党军始料不及，慌忙调兵遣将进行前堵后追。23日，第十九师抵达浙江省淳安县白马地区，击溃了尾追而至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领的两个团。27日，第十九师渡过新安江继续向北，于29日进入浙江分水县(今分属桐庐县和富阳市)。

12月6日，红十军团第十九师进入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安徽旌德县境，并迅速攻占旌德县城，经安徽泾县、宣城县(今宣城市)之间北上，威胁芜湖县，震慑南京市。就在此时，红十

军团突然电令第十九师回师黄山，与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会合。原来，第十九师出发后不久，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兵力“围剿”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红十军团，负责所有留守红军的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闻报后，电令方志敏、刘畴西等人，要求他们率红十军团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转到外线，同第十九师会合，在浙江开化县、遂安县、衢县、常山县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建浙皖赣边新苏区。中央军区的这一指令，使得红十军团放弃了闽浙赣根据地，全部出动到外线作战，导致闽浙赣苏区反“围剿”斗争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十军团三个师在黄山东南的汤口会师之后，遭到了国民党多路重兵的围堵。红十军团被迫向北转移，经乌泥关抵达黄山东麓的谭家桥。此时，急于邀功的王耀武率领的国民党补充第一旅一马当先，紧追其后，孤军突出，与其他各路人马相距甚远。

刘畴西获悉后决心在此打一仗，吃掉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改变被动局面。参谋长粟裕随即拟订了初步作战方案，但在如何使用主攻部队上，他与刘畴西产生分歧。粟裕认为由红七军团改编的第十九师千里转战，野

战经验丰富，应该担任主攻。刘畴西坚持让自己的老部队第二十师负责主攻。面对刘畴西不容置疑的态度，粟裕只好更改部署，让第二十师主攻，第十九师打穿插。红十军团埋伏就绪后，王耀武率领补充第一旅果然进入了伏击圈。然而，在此关键时刻，一个不应有的意外发生了。因为没有打过大仗，第二十师的一个士兵由于极度紧张，步枪不慎走火，过早暴露了目标。

王耀武一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立即下令火速散开，抢占路边高地。一场精心筹划的伏击战，变成了硬碰硬的消耗战。王耀武所率部队便是后来国民党有名的王牌部队精编第七十四师的前身，战斗力很强。第二十师、二十一师虽然英勇战斗，但因实力悬殊，无法抗衡，溃败四散。埋伏在另一处的第十九师迅速出动，但也失利，师长寻淮洲中弹牺牲在战场上。刘畴西被迫下令撤退，向北转移。一场关系到红十军团生死存亡的伏击战，以惨败结束。谭家桥一战，红十军团伤亡过半，元气大伤，陷入了艰难困境。

1935年1月，红十军团佯装进军芜湖、南京，突然掉头南下赣东北。粟裕和刘英带着八百余人先头部队在前开路，方志敏跟随先头部队行动，

由刘畴西率主力部队跟随其后。粟裕深知形势险恶，敌人醒悟过来之后必然会对红十军团进行合围，必须抢在敌人包围圈合拢之前突破封锁线，才能安全到达赣东北。他们忍着饥寒，连续急行军，有的战士请求休息一下，粟裕果然制止，直到冲出尚未合拢的封锁线后，才下令休息，焦急地等待主力部队跟上来。

但是，在后跟进的刘畴西却在距离粟裕先头部队五里路的地方下令安营住宿。粟裕得知后，大吃一惊，立即向方志敏报告，提出情况紧急，决不能再迟疑延误，主力部队必须趁夜通过封锁线。方志敏认为有道理，随即让粟裕以他的名义写信给刘畴西，限令今夜迅速跟进。信送走后，粟裕仍不放心，他再次向方志敏建议由自己回去协助刘畴西指挥部队通过封锁线。方志敏想了想，觉得粟裕的资历低，很难说服刘畴西。他决定自己亲自前往，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说服刘畴西将部队带出险境。方志敏让粟裕、刘英率先头部队继续前进。

当天晚上，粟裕和刘英奉命前行。方志敏回去后却没有能够说服执拗的刘畴西，主力部队耽误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次日清晨，红十军团主力部队被国民党重兵围困在冰天雪地的

怀玉山区。红十军团官兵与敌人战至弹尽粮绝，最后全军覆没。方志敏、刘畴西等被捕后壮烈牺牲。在狱中，方志敏写下《清贫》《可爱的中国》等不朽名篇。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国民党反动派绝对优势兵力的疯狂追堵围攻下，艰苦奋斗，浴血奋战，书写了悲壮的历史篇章。时隔14年后，1948年9月，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发动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城，活捉了王耀武。

1935年1月，粟裕、刘英率领抗日先遣队从怀玉山突围的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与闽浙赣省委会合。不久，闽浙赣省委向粟裕他们传达了1月15日中央的指示电，命令以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五百多人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任务是“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2月初，红军挺进师正式组建，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王永瑞任参谋长，黄富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支队，一个师直属队。红军挺进师决定在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创建红军游击根据地。2月下旬，红军

挺进师从江西德兴出发，向浙西南挺进。

红军挺进师战斗在台州

1935年3月上旬，粟裕、刘英率领红军挺进师翻越武夷山进入闽北地区。3月20日，经浦城县境翻越了闽浙边的仙霞岭到达浙江江山县。26日，挺进师袭击了龙泉溪头，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排和一个保安中队，拉开了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战斗序幕。

4月下旬，红军挺进师进军到浙江庆元的斋郎地区。此处为庆元、龙泉、景宁三县边界的高山。这时，敌浙江保安第一团，福建保安第二团与地方反动地主武装“大刀会”共计三千多人试图三路合击红军挺进师。粟裕一面派员侦察敌情，一面亲率参谋人员勘察地形，精心筹划歼敌方案。4月28日，经过一天激战，红军挺进师以少胜多，大获全胜，歼敌三百多人，俘虏两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百五十多支，轻重机枪五挺，子弹上万发。斋郎战斗的胜利，迫使国民党保安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转攻为守，龙泉河以北敌人力量比较空虚，为红军挺进师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时机。5月上旬，粟裕率挺进

师进入到龙泉、遂昌、松阳三县边界地区，将部队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粟裕和刘英决定将第四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继续活动，牵制敌人。由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新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各部随师部辗转游击于浙赣线以南的汤溪、龙游、金华、武义、处州（丽水）等地，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吸引国民党主力北调。

红军挺进师是擅长于野战的正规军。为了更好地开辟游击根据地，粟裕和刘英确立了游击战的指导思想，实现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将部队化整为零。粟裕及时总结游击战的战术与作战规律，提出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游击方针，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飘忽不定、出没无常、掌握主动，支配敌人等战术，使得红军挺进师的战术越来越灵活多变，机动敏捷，即使面对数十倍的敌人“围剿”，也能够应对自如，让敌人大感头痛。粟裕还要求部队在开展游击战时，注意宣传和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建立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成为游击基点，作为以后部队的活动“落脚点”。不到五个月，红军挺进师发展到1500多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也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覆盖江山、浦城、龙泉、遂昌、

松阳等五个县。粟裕、刘英和红军挺进师名声震惊了浙江大地，国民党的《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甯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

6月上旬，为打破国民党的“清剿”，红军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在松阳小吉召开会议，决定第一纵队到永康、缙云、青田、处州、仙居、东阳及永嘉北部一带活动。于是，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在纵队长王屏率领下穿过永康，进入缙云，逼近仙居，逐渐向台州挺进。

6月下旬，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从仙居莲台乡进入台州，并到上井、十三都等地活动，欲找红十三军仙居游击队余部未成。8月1日，第一纵队从永嘉再入仙居十三都，经过皤滩、溪头、横溪、湫山、曹店等地，一路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在仁庄，歼灭了驻仁庄的永嘉、仙居两县的国民党地方民团。后转入永嘉、青田县境。11月1日，由纵队长王屏率领的第一纵队一部分战士，从永康的八保西坑（今属磐安）进入仙居的金坑（今名宝坑），经大陈、林坑口、马家平、东坞、秧田、西溪、上岙，到缙云岩背。一路上，他们书写大幅革命标语，号召群众起来同国民党政府和土豪劣绅作坚决的斗争。

1935年9月，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在王屏、张文碧等率领下再入台州，从方前乡进入天台，经过街头镇，穿过天台西区，绕过天台城，跨上金鸡岭，行程一百多里，到天台北山的塔头寺住宿。第二天又翻北山离开天台，转往新昌。红军突然入境，神速穿过，立即离开，被当地群众称之为“天兵神将”。

10月23日上午，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第二次进入天台，突然出现在街头镇。他们未放一枪，就解决了当地国民党驻军保安队的哨兵，俘虏了全部保安队员，缴了全部枪械。随后，一部分红军提着墨汁桶，拿着大笔，在墙上书写革命标语，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另一部分红军冲进大地主家里，打开粮仓、箱柜，把衣服、布料、粮食分给群众。红军进入街头镇，吓得国民党区长赤脚逃跑。在街头镇，当红军到商店里买毛巾、跑鞋等日用品时，店主由于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不敢收钱。红军战士就对他们进行解释，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要打击的是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军队，要没收的是从劳动人民头上剥削来的豪绅地主的财产，对于正当的买卖，一根针也不能白拿。店主听了解释，看了眼前的事实，万分感慨，连连称赞红军好。当天，红军

夜宿峇溪里村，第二天一早翻过牛砩岭，进入三州乡，逮住两名平时欺压百姓的国民党乡长和一名保长。当闻讯而来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卫团追击红军赶到梅枝岭时，红军居高临下，予以还击，并处决了国民党乡长和保长后，进入新昌县境。

红军挺进师从浙西南活动到浙东，逼近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为了对付红军挺进师，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处设立“浙南剿匪指挥部”。

这次“清剿”粟裕、刘英所率的红军挺进师，蒋介石调动了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二个团七万人和地方民团武装近四十个团，里三层外三层将浙西南地区围得水泄不通。面对敌人重兵一波一波地压过来，粟裕、刘英豪不畏惧，决定各率一部分二线作战。采取敌进我退、避实就虚的战略，留下一部就地坚持，其余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敌人后方去作战。计策一定，粟裕立即行动，率领主力部队巧妙地突围出去，运用游击战术同敌人周旋，寻机打击敌人。在此期间，粟裕率领部队南北转战，经常把活动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的浙赣线南侧，就连汤恩伯的老家武义、陈诚的老家青田、蒋介石的老家奉化也经常光顾，令蒋介石恼怒不已。

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在纵队长王屏、政治委员杨金山、政治特派员张文碧等人率领下，挺进浙东台属地区。运用昼伏夜出、远程奔袭、反道而行、敌集我散、避实进虚、声东击西、化装巧取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四进仙居，三过天台，横穿临海，进袭黄岩，多次取道新昌、东阳，活动在大盘山、括苍山、天台山之间，一次又一次地挫败国民党武装的追击“清剿”，搞得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安。

11月中旬，红军第一纵队六十多人从临海县里后坑村第三次进入天台县，经龙溪、天柱，到达小溪坑的大屋基村。在临海里后坑村，红军宿营在群众的屋檐下，不进百姓家。他们向群众买米、买柴、买菜、买鸡蛋，都付足够的钱，即使在军情紧迫日夜兼程的急行军途中，在田头地角挖了群众的蕃薯，拔了群众的萝卜，红军都在蕃薯窟、萝卜坑边放上铜元。在天台大屋基村，群众主动给红军送粥送食，红军吃后以铜元做酬。傍晚，红军召集全村百姓，宣传革命道理，宣传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第二天凌晨，红军悄悄地离开大屋基村，向东阳方向前进。红军在天台大屋基村住宿后刚离开，国民党武装就进村“追剿”，并向群众追问红军的去向。当地群众为了保护红军，抄小路赶上

红军通报消息，另一群众则给国民党武装指了另一个方向，使国民党的“追剿”落空。

11月上旬，张文碧率部分红军到永嘉、仙居交界的括苍山区红十三军仙居游击队的活动区董坑口村，找当地的游击队。11月12日，又到仙居境内的岭梅、溪上地区寻找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因游击队已被国民党破坏而离开仙居。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向临海挺进，辗转于临海、天台、新昌、东阳、缙云、永康等县。

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进入大盘山区后，游击范围日益扩大，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专门设置“大盘山绥靖专员公署”，调集临海两个中队武装，集中永康、缙云、东阳、仙居四县地方武装，向大盘山进剿。11月下旬，坚持在大盘山区游击的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王屏、杨金山部，被国民党保安队和地方民团狙击分割，战斗频繁。杨金山所率的部分红军，最后在玉环岭寡不敌众，全部牺牲。11月29日，纵队长王屏所率的十多名战士隐蔽在仙居、缙云边界的苦竹坑（今属磐安）被“进剿”部队侦悉，浙保五团和地方民团四五百人实施围攻，王屏不幸连中数弹身负重伤，被敌人围住。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王屏宁死不屈，

最后壮烈牺牲。

1935年12月中旬，张文碧所率的战士重回大盘山区，面对严峻形势，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同时打听联络失散战士。红军战士以永康后坑、西坑一带为立脚点开展活动。张文碧带领二十余人进入仙居的秧田地区（今属仙居横溪镇）。这一带原是“浙西工农革命军”（后为红十三军）的活动区，群众见红军回来了，喜出望外，很快应张文碧的要求把十多名红军分别安置在上处、中央坑等地的炭窑里。数天后，张文碧到有利于隐蔽活动的豆腐寮村。在与村民的交谈中，张文碧发现有一对村民夫妇李炳贵、张小娥对共产党和红军很有感情，决定选择这户人家为立足点。李炳贵与张文碧一见如故。在征得李炳贵同意后，张文碧把分散在各地的红军，也集中到李炳贵家。山上缺少大米，李炳贵翻山越岭到横溪等地为红军购买粮食、药物。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张文碧与李炳贵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工农红军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1936年1月上旬，春节将临，工农红军生活困难。在当地群众的建议下，张文碧等战士决定打土豪以解决军需之急。1月14日，张文碧派出红军六人，在当地十余名积极分子的配

合下，冒着大雪，翻山越岭来到仙居北岙村，抓走大恶霸地主、国民党乡长的两个儿子，要求该乡长拿出一千五百元银洋给红军解决军需赎回儿子。但该乡长向国民党政府告发。张文碧感到事已暴露，于是一面通知参加此次行动的积极分子转移隐蔽，一面率部转移到缙(云)永(康)边境。

1936年2月上旬，国民党“大盘山绥靖专员”调集缙云、永康、东阳、仙居四县的保安队及地方民团对八保山和秧田地区进行全面“清剿”。“清剿队”进入仙居秧田地区后，在豆腐寮李炳贵家搜出了红军帽子，立即将李炳贵的房屋焚毁。李炳贵的妻子张小娇怀孕在身，被“清剿队”抓去，当夜对张小娇等人严刑拷打，妄图从他们口中获知红军下落。张小娇等不畏强暴，坚不吐实。“清剿队”毫无办法，在次日撤离时，把秧田地区群众的财物抢劫一空，将张小娇杀害于秧田村菜园口。参加过红军活动的积极分子个个遭受通缉，有的离井背乡达十余年。

粟裕晚年在回忆录中对“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作了深情、详细回顾。书中写道：“活跃于浙东地区的游击队，出没于瓯江北岸的仙居、温岭、三门、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丽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并以永缙边的金

竹峰、黄弄坑为活动中心，建立了党的浙东特委。”“一九三六年底，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三十几个县境。”“敌人的烧杀惨无人道，对我们的同志不仅是枪击和砍头，甚至把他们当众‘开膛’，割了心肝去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不知其数。但是，敌人越残暴，革命军民的反抗越坚决。我浙西南革命在这场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壮丽篇章，将永留青史！”

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进军台州，打击国民党统治势力，爱护贫苦百姓，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台州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台州老百姓倾情倾力支援红军，书写了军民亲如一家人的动人篇章。红军挺进师在台州人民的支持下，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与国民党周旋。红军挺进师指战员们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台州人民的心中。

(作者单位：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长空下的记忆

王 俏 允



陈波，1931年11月8日出生于天台县城关镇，曾经是抗美援朝空12师36团的一名机械师。该师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取得了击落击伤六十余架敌机的战绩，在空军各参战师的战绩榜上排名第三。1953年4月7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汇报作战情况时指出：“在所有参战部队中，（第12师）是一番作战打得最长的一个师，也是进步最快、战果对比最大（击落击伤敌机与自己被击落击伤之比为2：1）的一个师。”1953年10月1日10点45分，空12师48架飞机以整齐壮观的队形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陈波的父亲陈学巧是国民革命军第61师361团的一等军医佐，在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战役中牺牲，其名字被刻在天台山瓦窑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上。1947年，陈波凭国民政府颁发的抚恤令到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就读。1950年1月1日，进入苏南军区文工团工作。两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招生，他顺利通过了文化考试和体格检测，成为空军第六预科总队的学员，赴杭州笕桥机场学习政治、军事知识。10月，成为济南空军第五航空学校机械科的一名本科生。1951年4月15日毕业后，陈波被分配到空军航空兵第12师36团当机械员。该师共有飞行员45名，米格-15战斗机49架，由师长王明礼、政委李明刚率领，于1952年初从上海虹桥机场出

发，陆续抵达辽宁丹东大孤山野战机场，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战斗行列。

抗美援朝战争伊始，志愿军没有空军。美军仗着P-51螺旋桨式战斗机耀武扬威狂轰滥炸，令志愿军吃尽了苦头，后勤供应也时常被阻滞。来自安东、凤城等地的民工削平地面，用砂石、草垫和特制的钢板铺设了1500米长、40米宽的跑道，夜以继日抢建了大孤山机场。在苏联友军的援助下，志愿军终于夺回了三八线以北的制空权，开辟了著名的“米格走廊”。

当时空12师采用的是苏联研制的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相比美军后来更换的F-86喷气式战斗机，性能上各有优劣。米格-15由于推重大，爬高快；F-86机身重，俯冲好。2.米格-15配有3门机炮，一门大口径37毫米（H-37型机炮），两门小口径23毫米（HC-23KM型机炮），威力更大；F-86配备的是口径12.7毫米机枪（勃朗宁M2HB），威力小但弹道直、射速高。3.米格-15的安全性能较好，只要没被打中要害，基本都能飞回来；F-86相对比较容易被打重创或击落，但操纵性能更高。

然而，美国空军都是经验非常丰富、飞行时间多在一千小

时以上，甚至几千个小时，且多数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志愿军飞行员却只飞行过百来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在实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完全是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和不怕死的勇气在战斗。

抗美援朝过程中，空12师涌现出二等功臣团1个，其他立功单位54个；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1名（鲁珉，后被剥夺英雄称号）；二级战斗英雄、空中优秀指挥员1名（郑长华）；一等功臣9名；二等功臣59名；三等功臣836名。

荣耀的背后，凝聚着英雄的鲜血。说起那些牺牲的战友，陈老依然清楚记得他们的机号和名字。“18号机孙念金，当场机毁人亡。13号机罗煜，失去14号僚机的掩护后也牺牲了。还有19号机郭道远，他已经跳伞了，结果还是被美军打穿降落伞。遗体被找到时，手里还握着手枪……后来被追记二等功。”他也提到了15号机飞行员鲁珉，激动地述说当时这位“打F-86能手”的战绩：“他一个人打下来5架F-86，第一次就连着打落两架！有一回飞机受了伤，他照样飞回来。我们数了数，机身上有57个弹孔！”

长空中战况激烈，地面上亦紧张艰难。为了保证战斗胜利，机务人员

立下了“故障不过夜”的誓言。他们天不亮就起床，常常通宵达旦，时刻准备着检查、修理、维护工作，保证战斗机随时可以起飞作战。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低温，对人体承受能力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呼出的口气全是白烟，眉毛胡须间都是冰渣，有时候眨个眼的功夫连睫毛也会冰在一起。许多人长了冻疮，手指烂得手套都戴不进去，只得去有火炉的休养所待上几天，等手指好些再回来继续工作。除了冻疮，严寒带给陈老的还有久治不愈的胃溃疡。因为等他们回去用餐时，饭菜总是冰凉的。从战场回来后，陈老为此在空军医院住了好几个月，回到杭州部队里还曾复发。

1954年10月，陈老回到天台。1955年在天台县民政局的推荐下，作为调干生入读浙江省教师进修学院物理科。1957年，他被分配到宁波鄞县一中（今鄞县中学）教物理，1962年调到钱湖中学（今东钱湖旅游学校），现任宁波东泰机械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一直未退休。

几十载光阴如白驹过隙，陈老鲜少提起这段往事，以至于身边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众人的眼里，陈老就是一名退休的物理老师。采访过程中，陈老始终透露出一种谦逊与淡泊。他记得米格-

15配备机炮的大小口径，记得跑道钢板上用来增加摩擦力的洞，记得在凤城县大堡机场时苏联空军穿着中方制服迷惑敌人，记得为守护鸭绿江大桥和拉古哨发电站而响起的隆隆炮声……然而当笔者数次问起他个人时，他总是和蔼地笑笑，寥寥数语带过。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年轻弱小的中国志愿军空军与强大彪悍的敌人正面碰撞，在血与火的较量中飞速成长。他们以“空中拼刺刀”的大无畏精神，通过实战积累起宝贵的空战经验。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战争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那些浴血拼搏的峥嵘岁月，值得被永远镌刻在记忆里。

（作者单位：天台县委党史研究室）

满堂红妆十里长

胡建新

小时候，我在天台农村看到的结婚场面十分喜庆，家境有好与差，排场有大有小，但总体风格是相似的。那时候的乡下，路是石子路，嫁妆都是扛着挑着的，迎送亲队伍浩浩荡荡，一派喜气洋洋。这对乡村来说犹如好莱坞大片，吸引人们驻足围观，赞叹祝福。古时，新娘进门后要举行拜堂仪式，这是婚礼过程中最重要的大礼。因古代婚礼中的交拜礼都是在中堂举行，故称“拜堂”，又称“拜天地”“拜花堂”。这一习俗，广泛流行于全国许多地区。

“满堂红妆十里长，花轿浪得十里狂，喜糖撒得十里甜，老酒飘出十里香。”听长辈说，旧时豪富人家嫁妆惊人，床榻、桌凳、器具、箱笼、被铺等日常所需一应俱全。嫁妆多漆成红色，贴上“红双喜”，故称“满堂红”。

天台人的拜堂仪式，多在新娘进门后紧接着举行，地点多设在“大堂前”，从进门开始有进门传代——拜

和合神马——拜堂——长辈拜见礼等几个关键环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提倡勤俭节约，传统婚俗匿迹数十年，但仍然保留了一些环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活节奏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婚礼朝西化方向发展。而近些年，随着传统文化复兴，人们又开始回归中华传统婚俗礼仪。

记得2017年秋，我在天台县城见到天台传统婚俗，在国清寺边上的和合堂举行，一种庄严、喜庆的美妙音乐在天台山和合小镇上空回旋，数千市民闻讯赶来，我也夹在人群中，大饱眼福。

我在人群中踮着脚尖伸长脖子看，只见和合堂呈现复古的建筑特色，灯笼高悬，彩带飘飞，美轮美奂。市民一路跟随过来，近距离感受传统婚俗的魅力。迎亲队伍在和合小镇集散中心集合出发，队伍前面扛有8块带有迎亲、和合字样的大红喜牌，

寓意天地人和，喜气盈盈。有两位手捧莲花的和合孩童，寓意喜庆吉祥，是民间喜神、财神的象征，步行在轿子的前端。新娘、新郎身着龙凤褂。朱红色的八抬大轿，图案鎏金，四周刻有牡丹、蝴蝶、仕女等吉祥图案。“起——轿！”司仪一声号令，8位轿夫缓缓将大红轿子抬起，紧随轿子的是新娘从娘家带的彩礼，有4对红色扛箱与2担朱色酒坛，队伍一路缓步前行，充满了喜气，一路向东缓慢游行，向和合人间文化园移动。

经过数十分钟，队伍到达和合人间文化园，只见这庄园内张灯结彩，大红的地毯从门口外铺到和合堂。新郎站在扎满鲜花的花台前，旁边众亲友在此等候。

在新郎的陪同下，新娘披着盖头在伴姑的扶持下下轿，跨过第一道门槛，司仪将准备好的红布袋铺在道地上，在第一个天井的通道上设置一个“火盆”，让新娘迈过去。新娘迈时，伴姑在两边为新娘捞起婚衣下摆，又在两旁扶住新娘两臂，赞礼者慢声高呼“红红火火”。在呼声中，新娘轻提莲足，轻盈而过。新娘从“火盆”上走过，寓意“传宗接代”，跨过红火盆，寓意家庭事业红红火火。至和合堂中堂，新娘与新郎一道完成攒香、拜和合二仙、拜天地、敬茶、喝和气汤、见过男女双方长辈等传统礼仪后，至

此圆满礼成。

拜堂又称为“拜天地”，是婚礼中一个很重要的仪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司仪大声地说：“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这其中，“拜天地”是代表了对天地神明的敬奉；“拜高堂”是指对男方父母行礼，表达孝道；“夫妻交拜”则是代表夫妻相敬如宾。在某种程度上，“夫妻交拜”是在古代少数可以让女性与男性同一地位的一种体现。

天台传统婚俗蕴涵和合文化的精髓，寓意红红火火，和和满满，夫妇同心、家庭和睦、儿孙满堂。

出于对和合文化的喜爱，我对“满堂红”嫁奁充满好奇，在2017年春夏季之际，我通宵达旦翻阅史料，搜集整理材料，至今难忘。在民间文艺家曹志天先生指导下，还提供了他母亲亲口叙述的资料，我终于弄懂了“满堂红”的来龙去脉。

天台的婚俗习惯，最早见于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天台县令郑至道所著《重婚姻》一文，经历1000年传承发展，终于形成今天这一既隆



重热闹又意义深远的传统婚俗。

天台传统婚俗，从“起媒”到“回娘家”，共有22项礼节程序，既缜密细微，又隆重热闹。具体为：起媒、送地脚隐、相亲、合八字、小定、大定、送奩、开额、新娘装扮、铺房、办暖房酒、上轿、拜堂、读《告庙文》、长辈见面、喜宴和坐十尊、照床、喝和气汤、撒帐、唱撒帐歌、望三日、新娘下厨做团圆麦饼、回娘家。

从以上22项仪程中，可以看到婚俗大部分程序都是围绕新娘而设立的，可见这一民俗对妇女的尊重。除天台外，类似婚俗在浙江大部分地区都有，而天台传统婚俗与他处婚俗不同的，是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故事，体现在“送地脚隐”“祭和合马”“送满堂红嫁妆”“坐十尊”“喝和气汤”和“做团圆麦饼”等六项环节。

送地脚隐。即将男方的家庭住址，通过媒人之手送给女方家庭，以利女

方家庭派人到男方家庭邻居亲友处打听、了解、考察。送满堂红嫁妆。女方将嫁妆置办齐全以后，将嫁妆种类、名称、数量一一在红纸上写明，派人送到男方家中。男方在结婚前一天派出人工（俗称行郎），到半路迎接女方的嫁妆。路程一般是“女方送三，男方接七”。嫁妆好差区别很大。大户人家叫“大嫁”（又叫满堂红嫁妆），中等人家叫“半堂嫁妆”（只嫁卧室内的家具用具），贫苦人家叫“前节嫁妆”（只嫁卧房前面一节家具用品）。“大嫁”称“满堂红”，除了所有生活用具，还嫁生产用具。包括木器：卧房和客厅的所有用具，如翕柜、橱、桌、椅、凳、箱、桶等；瓷器：各种大小碗、盏、盘、碟、壶等；藤器：藤床、藤椅、藤茶几等；竹器：凉箱、竹席、竹枕、箩筐、篮子、筛子等；床内用品：棉被、枕头、布帐、纱帐、暖帐等；铜器：火盆、火笼、壶等；镚器：大小镚台、镚瓶、镚壶等。

祭和合神马。这是拜堂仪式的一部分，拜堂时，中堂正中高挂“和合二仙图”，并在八仙桌上放置“和合神马”，表示百年好合之意。祭和合神马在拜祖宗之前，满堂亲戚好友向置放在八仙桌上的“和合神马”行三拜三叩之礼。接下来是读《告庙文》。在拜堂仪式结束后，将和合神马捧至院中对天焚烧，请和合神马上天禀报，这户人家阖家和睦。



读《告庙文》。也是拜堂仪式的一部分。拜堂时，上头的横桌上置放“高曾祖”牌位，新郎新娘由伴郎伴姑引入，分站在左右两侧。先由新郎父亲跪在祖宗牌位前行三叩九拜大礼，诵读《告庙文》，向祖宗报告今日为裔孙迎娶新娘，求祖宗保佑。宣读时，新郎新娘在旁行三拜九叩大礼。《告庙文》读毕，才开始拜堂，这是体现孝道。

坐十尊。是天台传统婚俗中最高档次的仪式，只有大户人家才举办。民国时县后巷曹熙家、杏庄巷许世泼家、铺前村张凤仪家都曾办过。所谓“坐十尊”，就是由10名“十尊娘子”陪着新娘子一起举行婚宴，并向宾客敬酒的仪式。在大客堂的正中用凳子和木板搭起一个6尺高的方台，台上放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红烛和当晚宴客酒肴，桌子后面设一把太师椅，这是新娘座位。大客堂两侧各搭5个台，比新娘的台稍矮一些。台上各设半边桌一张，太师椅一把，放烛台设酒和菜肴，由“十尊娘子”入座。由新娘子和十尊娘子一齐起立端酒示意宴会开始，十尊娘子每过一刻钟，就下台与新娘一起向宾客敬酒，一直到第5次，与新郎新娘一道向宾客敬酒，此时宴会接近收尾。

喝和气汤。地点在洞房，时间是新郎新娘喝过交杯酒之后，执事把夫家一家老小带进洞房喝“和气汤”。“和气汤”一般用红糖冲开水。意思红红火火，和和气和。



团圆麦饼。古人有“三日下厨房，洗手做羹汤”的说法。结婚前三日，新郎不上山，新娘不出间。第四天，新娘子开始劳作，下厨房做肉丸糊麦饼，给一家老少品尝，又称团圆麦饼。麦饼做好，先孝敬公婆，再按家中辈分大小依次享用。做麦饼时，至亲邻居都会来观看新娘厨艺。因此，天台姑娘未出嫁之前就要学习制作麦饼、糊拉汰等粉食技术。

天台传统婚俗自明清发展到民国达到完备。民国二十四年（1935）。天台城关县后巷工部主事曹醉莲儿子曹熙（系民间文艺家曹志天先生的父亲）与天台城关溪头村清守备姜竹林孙女姜其妹的婚礼，是对这一婚俗的完美体现。姜其妹的嫁妆沿路迎送五里多长，前头进了夫家，后头还在娘家院中，尚未搬完。婚宴之时举行了这一项目最高规格“坐十尊”。在当年可谓万人空巷，轰动全城。

（作者单位：天台县基投集团党务工作室 浙江省作家协会“新荷计划”青年作家人才）

黄岩历代书院考

王 康

书院之名，源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皇宫设立的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改名集贤书院，为国家所设立的图书校勘、遗书征集之所。唐代私人藏书馆所也称书院。北宋王安石说：“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鼓励儒士们在城市或山林讲授，从学者多者数十百人，书院逐渐兴起。全国闻名者有岳麓、白鹿洞、应鼓和嵩阳四大书院。南宋时期，书院规模和制度正式确立和完备，数量多，规模大，地位高，影响广几乎取代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除官学外，凡私办讲学之所皆称书院。

一、南宋

南宋理学家陈襄（福州人）任仙

居知县，下乡为学生讲经，《撰劝学文》：“一家为学，则宗族和睦；一乡为学，则闾里康宁；一县为学，则风俗美厚。虽有恶人，将变而为善。”书院常礼请著名学者讲课，如黄岩樊川书院请朱熹，东屿书院（今属温岭）请叶适，临海上蔡书院请王柏（朱熹三传弟子）。学习方式开放，开展学术争鸣，培养了一批台州人才。书院还祭祀先生和先贤，明《赤城后集》中，有黄岩《新建文献书院记》（朱右撰）：“文公朱子（朱熹），以清献杜公（杜范）配，别为祭祀二徐先生（徐中行、徐庭筠）、郭磊卿、赵师渊、杜煜、杜知仁。”《柔川书院记》（张翥撰）：“中祠二程（程颐、程颢）、朱子，侑以先生（黄超然）。”

黄岩樊川书院山长杜煜，礼请朱熹主讲，杜煜等13人成为朱熹门人，创立朱子理学的支脉南湖学派。有十

余人中进士，进入仕途。后人评曰：“樊川书院堪与新安、考亭鼎立为三，以宇内鼎峙之书院。”

二、元代

元代限制书院发展，审批数量紧缩，书院逐渐从民办转为官学化。官方任命书院山长，或由官学的学官转任，山长满任可转任学官。如周仁荣（临海人），任缙云县美化书院山长，尽心教化，士俗为变，征辟为行省掾史，官至翰林修撰，集贤待制。元代书院基本上不是学术争鸣的场所，而是官方施行教育的载体。明《赤城新志》记载，元代黄岩有樊川书院、柔川书院、文献书院和回浦书院（今属温岭）；临海有上蔡书院、鉴溪书院；仙居有桐江书院、安洲书院。但私学比较兴盛，有家塾、义塾等基础教育机构，补充官学教育的不足。名儒设塾的私学似民办书院，招生不受地域和宗族限制。元代临海泰不华（后任台州路总管）求学于乐清李芋光，黄岩徐宗实（明初任兵部侍郎）求学于平阳史伯璿。也有外地士子来台州书院求学。

黄岩柔川书院，原是“南宋十大儒”之一黄超然创办的义塾，其子黄中玉改为书院。元代文学家、翰林学

士张翥撰《柔川书院记》：“辟墅为书院，中祠二程（程颢、程颐）、朱子，侑以先生（黄超然）。东西两庑为师之舍，后堂为会讲行礼之所。”

黄岩文献书院，在黄岩委羽山东侧，元末浙江行省枢密副使刘仁本（黄岩人）建，以纪念朱熹的执教成就。元代名士危素、朱右撰《记》。

三、明代

明洪武二年（1369）十月，朱元璋上谕中书省臣：“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此最急务，当速行之。”县学是一县之学府，明代规定县学生员人数为20人，但明中叶后严重超员，许多优秀学子就读书院，地方官允许兴建书院，因而明代书院大多是官方所建，或官员、绅士所建。如台州知府阮勤重建上蔡书院，知府周志伟建赤城书院，黄岩知县建紫阳书院；官员陈璉建白云书院，冯凤池建南屏书院，陈选建丹崖书院，金贲亨建崇正书院，王士性建白象书院，陈锡建南衡书院，谢省、谢世衍建方岩书院，黄绶建石龙书院等。其中以方岩书院和石龙书院为最著名。

黄岩石龙书院，位于翠屏山。明中叶礼部尚书黄绾致仕后创建，对学子讲解经世之学。嘉靖二十一年（1542）哲学史上有名的“石龙深辩”即发生于此处。

四、清代

清初，朝廷对书院采取严禁措施，惧怕书院广聚士子讽议朝政，传播反清思想。雍正十一年（1652），开始承认书院在儒学教育方面的作用，诏令各省创置书院。乾隆元年（1736）颁布上谕，对书院性质、山长聘任，生员考核，教育章程作出规定，“命定教官品级”，此后书院大为发展，清末光绪间达到高峰。台州知府张联元建近圣书院，知府王绍燕兼任赤城书院山长。知府刘璈自同治三年（1864）至同治十一年在任，督同各县新建、重建、扩建或整顿书院32所。清末台州有书院144所，占浙江

十一府书院总数的14%。

黄岩九峰书院，位于九峰山麓（今九峰公园内）。清同治八年（1869），知县孙熹废九峰寺改建书院，聘请经史学家王棻任山长，培养许多优秀人才，如喻长霖、章稔、王舟瑶等。

五、民国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书院改办中小学学堂，私塾和初等小学并存。民国时期，随着新办小学的发展，私塾逐渐减少，但仍有极少数私塾延续至民国后期。民国十五年（1926），温岭叶遇春（秀才）撰《螭山学堂记》，记述其演变过程。大意是，明初镜川（牧屿）叶氏家族建乡约堂（所），后改兴善堂，清代改为书院，民国改为学堂。

（作者单位：黄岩区委统战部）

赵孟頫入天台史考

许志刚

一、赵孟頫入天台的时代背景

南宋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9月，赵孟頫出生在吴兴（浙江湖州）一个家世显赫的贵族家庭，据《松雪斋文集·外集》记载，其曾祖父师垂（宋太师）“南渡，自大梁来居吴兴”，父亲赵与峕是宋太祖赵匡胤第十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嫡系子孙，历任太府卿、知隆兴府、集英殿修撰、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等要职，书画技艺造诣颇深。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赵与峕去世，家道中落，12岁的赵孟頫随母亲丘夫人搬迁至甘裳桥河畔的老宅院居住，师从莲花庄名儒敖继公“致力于学”。期间，丘夫人屡次训诫赵孟頫：“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今日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汝幼孤，倘若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成人。汝若一事

无成，吾辈则不复有任何奢望矣。”于是，赵孟頫“戒石具左，朝夕诵斯，增益进取”，一年四季不舍昼夜，潜心研读诸史百家，“性通敏，书一目辄成诵。未弱冠，试中国子监”，一心博取功名，重新光耀门楣。

赵孟頫14岁以父荫补官，但是徒有虚名，没有实际官职，只能留在家中继续求学。期间，经敖继公悉心调教，他的书画技艺突飞猛进，“未弱冠，出语已惊其里中儒先，稍长，而四方万里重购以求其文。”在雅士鸿儒云集的吴兴城名声鹊起。

赵孟頫19岁通过吏部官员选拔考试，任真州（江苏仪征）司户参军，但边界战事频繁，宗室弟子不宜涉险赴任，真州知州苗再成便破例准许他坐领空饷。但是赵孟頫的薪水不足以养家糊口，主要还是靠沿街售卖字画贴补家用，家境每况愈下，早已陷入捉襟见肘、等米下锅的窘境。

宋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南宋都城临安沦陷。至此，长江以北地区的战事结束，如何统一政令、恢复经济民生、促进南北文化与商贸融通，俨然成为元朝统治者亟需解决的问题。

忽必烈及时采纳集贤阁直学士兼秘书少监程钜夫“兴建国学，参用南北”的治国主张，具体概括为五条措施：一、取江南仕籍，促进国家统一，官民和睦、疆土安定。二、通南北之选，倡导蒙汉同朝，南北文化融合、政治平等、开展商贸往来。三、立考功历，以才取士，举才唯贤、论功行赏。四、置贪赃籍，惩治腐败，整肃朝纲、激励廉政。五、供给江南原南宋官吏俸禄，安抚地方势力，积极推行新政，尽快恢复并改善当地民生。

忽必烈毅然拔擢身份卑微的“南人”程钜夫为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旨巡游江南搜访王孙贵族以及贤达人士共襄国是，进一步彰显大元帝国廉明、公正、包容的博大胸怀。

在程钜夫的搜遗名册中，宋室弟子赵孟頫，前丞相叶李、资政殿学士文及翁、六部侍郎谢枋得、孔子后裔孔洙、浙东提举孟文龙、枢密院国史修撰丁易东、监察推官张伯淳、节度推官胡幼黄、淳安县令曾子良、监察御史何梦桂、饶州三司提干祝泌、抚

州学士吴澄、鄞州文人陈允平等青年才俊，榜上有名。

然而，由于蒙汉民族长期积怨的矛盾空前尖锐，又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为首的南宋余部坚持武装抗争，南方战事一日三变、扑朔迷离，黎民苍生裹挟在两大敌对阵营中无所适从，个个投鼠忌器，人人如履薄冰。其中，以翰林院国史修撰方逢辰、庞朴，太府寺簿方逢振、枢密院国史修编丁易东、监察御史何梦桂、太学生范晞文、后补太学生谢国光、节度推官胡幼黄、衢州军事判官孙潼发为代表的江南处士，唯恐背负“降元投敌”的千古骂名，纷纷托病不出，游逸江湖遁入山林，更有甚者不惜装疯卖傻、自残肢体，执意归隐不仕。

赵孟頫深知，“变节事敌、猥琐无骨”的叛国行径必然使宗室蒙受耻辱，世代遭人唾弃；可倘若拒绝赴任，家中生计无从着落，自身还可能因抗拒归顺招惹杀身之祸。况且，应邀北上的宋人大多担任一些清要闲职，“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有一二，譬如余德、万一鄂、胡梦魁等勉强其得位者，不过台宪、文学、州县之类卑秩罢了。”生不逢时、报国无门，既不能施展经世才华又饱受世人诟病，所谓归顺的江南贤达，无非是大元帝国的摆设而已。

正当赵孟頫不知所措之际，敖继公牵线搭桥并资助盘缠，赵孟頫举家转移到德清外公家躲避。

赵孟頫的外公李仁本是当地的高门望族、参知政事李彦颖嫡孙，曾经以承议郎出任浙东提刑按察使。李仁本的小女乃赵与峇续配、赵孟頫的生母丘夫人；二女儿嫁给当年武康军节度使、如今位极人臣的福王赵与芮。可是自从赵与峇去世，李家姊妹已经断绝来往。赵孟頫在德清的日子并不好过，外公、外婆早已去世，表妹外嫁先皇太后谢道清的内侄、承信军节度使谢璠的长子谢晟孙，又因战乱音讯阻断，其余的娘家亲戚纷纷避乱迁徙，祖业易姓亲人离散。赵孟頫一家寄人篱下，举步维艰。

敖继公引荐的茅山士大夫管仲（直夫）住在东衡郊外。管仲是春秋霸主齐桓公著名谋士管仲的后裔，作为家族世袭的士大夫阶层，管仲饱读诗书博古通今，“精通律吕雅乐”、“不图虚名，不乐仕进”，加持家财丰厚且善于经营，世人又将他比喻作陶朱公（范蠡）投胎，素以“仗义举善、肝胆任侠”闻名乡间。

丘夫人与管仲原属同乡，李、管两家交往密切，此次可谓久别重逢。

管仲膝下无嗣，他将生养不易的小女管道升视若掌上明珠。管道升6岁那年，管仲在茅山庄园创办东衡书

院，聘请名师入室传道授业，实指望管道升技压群芳、凤鸣九天。

管道升时年15岁，她天赋异禀、才貌双绝，“家学熏陶、聪慧颖悟、少有诗名”，“翰墨词章，不学而能”，尤其擅长词牌诗赋和画竹。丘夫人非常喜欢管道升，不惜纡尊降贵亲自照料她的饮食起居。

管仲同样非常赏识赵孟頫。从《元史·赵孟頫传》及赵孟頫《松雪斋集》《管公楼孝思道院记》和《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中不难发现，管仲夸他“性情持重，未尝妄言笑，与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虽然穷困潦倒，可是凭藉才学与志向，迟早成为人中龙凤。管仲竭力游说他留在东衡书院授课传艺，共同操持庞大的家族事业。

然而，德清与临安近在咫尺，两地人员流动频繁，管氏庄园树大招风，元军的密探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名声在外的赵孟頫暴露行踪是迟早的事情。于是，为了避免坐累管仲以及家人，赵孟頫只能选择逃离，投靠远在东阳的族叔赵若恢。

时年，赵孟頫23岁。

二、赵孟頫入天台的机缘及杨氏兄弟

《宋史翼·赵若恢传》记载：“赵若恢，字文叔，东阳人，咸淳乙丑

(公元1265年)进士。宋亡，避地新昌山，遇族子孟頫，与居，相得甚。时元主方求赵氏之贤者，子昂转入天台，依杨氏，为元所获。”可见赵孟頫滞留在东阳的时间并不长久，随着元军控制绍兴各个州府，叔侄“相得甚”的日子甚短，他不得不再次转移至天台山躲藏。

赵孟頫为何选择天台作为庇护所，史学界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无非分为“寻亲访友”和“逃离灾祸”两种观点。“寻亲说”观点认为：1.与赵孟頫关系密切的表妹嫁给谢道清的内侄、承信军节度使谢璠的长子谢晟孙，天台皇都是谢道清故里，太后内侄谢光廷、侄孙谢似孙及其族人先后迁徙寺后、榷树等地，可谓枝繁叶茂，寻求庇护理当不在话下，寻亲的理由完全成立。2.天台境内还有一支更为显贵的宗亲血脉：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宋太宗赵光义的来孙、魏王赵士俶为躲避金兵锋芒，伴随宋高宗赵构辗转至台州章安，途中见天台山水清幽，民风俭朴、三教并举，历来为高僧、道士和文人墨客竞相膜拜之圣地，遂萌生迁徙念想。翌年，赵士俶辞官，携同宗兄一起，从临安迁徙至天台水南下菜园“筑室而居”。赵构敕令地方官府为赵士俶建造巍峨壮观的魏王府（又称赵王府），赏赐金字铁券以示世袭尊荣。赵士俶的后辈子

孙开枝散叶，逐渐散布到峇溪、东坑、何坊赵、下园赵、水亭等百余个村落，成为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

赵若恢肯定了解魏王赵士俶乃至“居天台（临海）”的书画家赵师宰家族的行踪，而赵师宰是赵孟頫曾祖父赵师垂（宋太师）的嫡亲兄弟。因此，不排除赵若恢替赵孟頫重新物色宗亲作为依靠的可能。这也为赵孟頫“寻亲访友”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宋史翼·赵若恢传》记载“子昂转入天台，依杨氏。”《天台杨氏宗谱·叔和公传》记载“元初，逮宋诸王孙甚棘（急）。孟頫闻其名而就避焉，公（杨叔和）馆而庇之。”《杨氏宗谱·赵松雪与叔和祖手帖》赵孟頫自述“缅想向时，托庇万间，获全残喘以有今日。”明成化八年状元、礼部尚书吴宽为杨氏后裔、福建提督全省都使司杨泽所题《赵松雪与杨叔和书》记载：“赵文敏公（孟頫）以诸王孙避兵其地，馆而庇之……叹宋之屡蹙于兵，仓皇四散。……不然，其不至于泣岐路而窜荆棘也。”——从中判断：赵孟頫抗拒元廷征召，成为“钦点要犯”，他没有选择家世浩荡的魏王府作为安身立命之地，而是冒险投奔素昧平生的平民杨叔和，究其根源实乃事态危急、慌不择路，不得已

而为之。

宣统《天台杨氏宗谱》及方志史料记载，敢冒天下大不韪、容留赵孟頫藏身寓所的“杨氏”，实指妙山杨氏家族杨叔宪、杨叔高、杨叔和兄弟三人。

老大杨叔宪(幼度)，原翰林院秘书大学士，执掌朝廷命官的敕黄和录白，他“器识宏深、刚正不阿”，“其明可以周万事之理，其道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足以发难显之情。”因与同乡贾似道政见不合，屡有纷争。杨叔宪怒斥贾似道“硕鼠弄权，国器私掌。先帝、官车晏驾，秋壑（贾似道）敢于矫诏废十七界会子，借强推《公田制》《打算法》囤财自私，铲除异己，嘯傲湖山沉溺酒色。导致失职与祠吏治日坏，朋党猖獗，国本动摇，国策空言，物价飙升，货币贬值。百姓怨声载道，无不痛恨入骨苦不堪言，无食欲食其肉、无衣欲寝其皮。”从而遭到贾似道、陈宜中等人打击报复，杨叔宪“士夫之无用模棱”，遂辞官返乡，在白云峰西侧佛陇“结草为庐、琴书自娱”。赵孟頫曾多次上山向他请教法书技艺。

老二杨叔高，庠生，早年在台州府为吏。据《杨氏宗谱·叔高公行传》记载，宋嘉定五年~元至治元年（公元1212~1321年），杨叔高“归隐

赤城山林”，“绝口不提朝廷利害”，“享年过百”。杨叔高“听闻弟叔和馆庇赵子昂，偶出山与相赠答”，足见他对赵孟頫的赏识。

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南宋残部在广东遭遇一连串兵败，宋大营四分五裂，随着“崖山海战”惨败，南宋彻底覆灭。

74岁高龄的杨叔宪惊闻噩耗，绝食七日而亡。杨叔高对“子昂受程钜夫之荐而仕元，大有不满之意”，手抄北宋吕南公《赠叔宪诗》婉言相劝：“轩昂不肯事雕鏤，放却名缰已十秋。举世有为皆负累，百年无闷更何求。长驱好意归吟笔，笑领真风贮酒瓿。嫌我生涯非濩落，纸编寒夜困灯油。”杨叔高借诗讽喻，理当铭记杨叔宪“大丈夫不患不得生，但患不得死，死苟中节，有何畏惧”之高风亮节，勿忘“亡国灭族”之伤痛和耻辱，苦心劝谏之意不喻自明。然而，“子昂待之如故。”——由此可见，由于时局、立场、心态发生本质改变，杨叔高与赵孟頫产生严重的分歧，只不过彼此心照不宣而已。

小弟杨叔和，庠生。《杨氏宗谱·叔和公传》以及《重修兴教寺碑记》记载：“公（叔和）博通经史，性喜结交，乐善好施”，主理家族祠堂事务，一言九鼎，重信守诺。赵孟頫给杨叔和的家书提到“今年六十有

五，头童齿豁，眼花耳重……老兄年过八袞，优游山林，亦是人间乐事。”由此推算，杨叔和至少比赵孟頫年长15岁，赵孟頫24岁入天台，杨叔和已经是年近四旬的壮汉。正是杨叔和经纶才识与肝胆相照的侠义心肠，方能与吴兴才俊赵孟頫不离不弃、生死相依。从杨叔和将赵孟頫接到妙山“馆而庇之”，到后来转移到飞凤山麓的兴教寺“历时三年”，杨叔和一直冒着被“株连九族”的风险，悉心照料赵孟頫的饮食起居和人身安全，始终担当保护神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杨叔和对赵孟頫有“再造之功”，以致后来“文敏公为翰林学士，承旨有书致谢，欲荣一官以报，公（叔和）坚辞不受。”显然，杨叔和淡泊仕途功名，不愿居功自恃，而是“蔬食步行”、“优游山林”。难怪明成化八年状元、礼部尚书吴宽不胜感慨说：“叔和之义所为可尚，而赵文敏公欲荣以一官，可谓知恩报德者。”

诚然，杨叔和肝胆侠义，不仅让赵孟頫“念之何日敢忘”，也为后世子孙所景仰。——“皇清崇祀敕建忠义祠”，杨叔和由此成为杨氏家族及世人口碑相传之楷模。

《杨氏宗谱·叔和公传》记载：“孟頫闻其名而就避焉，公（叔和）馆而庇之。”杨叔和固然是赵孟頫生命中的贵人，但是两人之前并无任何交

往，杨叔和不可能是促成赵孟頫“转入天台，依杨氏”的引渡人，肯定另有高人充当牵线搭桥之角色。而这个环节《宋史翼·赵若恢传》《元史·赵孟頫》及《天台杨氏宗谱》均无记载，《天台赵氏宗谱》也没有魏王府接纳赵孟頫入天台的任何记录。如此一来，唯一的线索就是杨氏大哥杨叔宪，他的作用自然而然凸显出来。

杨叔宪“越绍定乙丑，登王朴榜进士”、任翰林院秘书学士，“承旨二十余载”，谙熟皇室族谱世系并且与宗室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赵若恢为“咸淳乙丑（公元1265年）进士”，杨叔宪在贾似道擢升“平章军国机要”后辞官返乡，而赵若恢直到“宋亡，避地新昌山”，所以并不排除与同朝为官的杨叔宪早就结交为挚友的可能。虽然二人分隔两地，但是始终保持交往。——虽然目前缺失依据，可是随着地方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真相终将浮出水面并得到证实。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正是杨叔宪和赵若恢坚不可破的交情与信任，最终促使赵孟頫在生死危亡之际，别无选择地“转入天台，依杨氏。”

此外，任道斌校注《赵孟頫文集·系年简编》及故宫博物馆文献资料记载：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26岁的赵孟頫作成《尚书集

注》初稿，44岁完成著作，前后耗费19年；赵孟頫65岁时重新编辑并为之作序，即《重辑尚书集注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赵孟頫的《重辑尚书集注序》由“画友提举杨叔谦为其画朝服像”，并且此像是杨叔谦“精而益精者”之传世孤本。然而，有关“杨叔谦”的史料极少，除了已知“提举”的身份，有限的史料记载仅“善画，与赵孟頫同时，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作农桑国，孟頫题诗以献，称旨”寥寥数字。我们无法断定此人是同属东汉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杨震（字伯起，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清白传家而扬名天下）血脉的另一个干支、还是杨叔和的“从兄”或者“堂弟”。在此不敢妄论，恳请史学界人士给予更多的关注。

三、赵孟頫滞留天台的具体年份

在此之前，有些地方史学者对赵孟頫滞留天台的具体年份说法不一，有说“三年”，亦有“五年”，并且时间跨度从公元1276年延续至公元1282年，甚至直接断代至赵孟頫正式赴元的公元1286年。笔者耗费三年为此做专门的调查考证，根据详实的史料，足以认为上述观点既不严谨又缺乏可信的文史依据。

依据一：任道斌校注《赵孟頫文

集·系年简编》记载，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赵孟頫“居湖州故里，从敖继公致力于学。”追溯至公元1277~1278年，赵孟頫的履历罕见出现空白，直到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才重新浮出水面，“作成《尚书集注》初稿。”等于说明，公元1277~1279年的三年时间，赵孟頫平空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天台杨氏宗谱·重修兴教寺碑记》却明确记载“历时三年。”以此为据，与赵孟頫系年所缺失的三年完全吻合，直接印证赵孟頫隐居天台兴教寺“历时三年”的历史事实。

依据二：《天台杨氏宗谱》记载，公元1279年正月“崖山海战”后，杨叔宪惊悉“亡国灭族”的消息，“绝食七日，端坐而终”。赵孟頫受其长子杨起隆邀约，撰写《宋翰林院秘书学士叔宪墓志铭》，洋洋洒洒数百字的祭祀长文铿锵激荡、一气呵成，墓志铭落款“祥兴二年己卯三月上巳，宗室子昂赵孟頫顿首拜撰”。——“祥兴二年己卯三月上巳”，即公元1279年三月上旬，这是迄今为止最能印证赵孟頫依滞留天台的确切年表，此后才发生《宋史翼·赵若恢传》记载“（孟頫）为元人所获。若恢以间得脱。……钜夫深感其义，释之。”

依据三：清同治《菱湖志卷二·人物门》、清光绪《菱湖镇志》、清光

绪《归安县志》以及民国《龙湖区乡土地史》相关记载：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赵孟頫躲过搜遗御史程钜夫征召，返回吴兴潜心编撰《尚书集注》。元至元十七年~廿三年（公元1280~1286年），他寄宿在菱湖赵家弄、赵家墩的堂兄家里钻研书法诗文，偶尔出入杭城与吴澄、戴表元等人定交论文唱酬，期间“辞吏部郎中夹谷之奇荐举，拒任翰林编修。”实际这个时期，赵孟頫“穷愁潦倒”，一度蛰居在下昂村“赵家坟地守墓人”的小屋，直至“与张伯淳、凌时中等人受程钜夫荐，应召。”同年，管仲将25岁的管道升许配给33岁的赵孟頫。所以，赵孟頫公元1280年以后滞留在天台的论点不能成立。

显然，“公元1279年”是个足够断代的时间节点，此后有关赵孟頫所有的大事记，均发生在天台境外。因此，赵孟頫“隐居天台兴教寺，历时三年”的准确年份，必须以此为界往前推算，从而勾勒出清晰的历史脉络：公元1277年，经翰林院秘书学士杨叔宪牵线搭桥，赵孟頫由新昌山“转入天台，依杨氏”——杨叔和将赵孟頫“馆而庇之”，杨叔高“闻弟叔和馆庇赵子昂，偶出山与相赠答”——赵孟頫与杨叔和共同经历了一段“泣歧路，躡荆棘”、“托庇万间，获全残喘”的苦难岁月——“仓皇奔

窜”之余，杨叔和设法将赵孟頫转移至兴教寺隐居，酝酿创作《尚书集注》书稿——1279年二月崖山海战结束，南宋覆灭，赵孟頫为以身殉国的杨叔宪撰写《宋翰林院秘书学士叔宪墓志铭》——同年，三月上旬的某一天，26岁的赵孟頫在天台“为元人所获”。

这就是赵孟頫避隐天台三年的实际遇。

鉴于天台在南宋具有特殊而崇高的历史地位，赵孟頫转入天台之后又是否与太皇太后谢道清、宰相贾似道、光禄大夫宋之瑞、魏王府赵氏族人、避隐天台的张世杰遗孀叶氏夫人与幼子张舜功还有民间盛传“太皇太后谢道清以内侄、承信军节度使谢堃幼子谢昱孙‘李代桃僵’降元，派陈宜中掩护宋恭帝赵显、全皇后兄弟一千人隐姓埋名在天台秘密潜伏”相关的人物、事情发生交集，还留下多少尚待发掘的文献或墨宝，目前不可详知，只能寄望于日后更加深入持久的调查和考证。

笔者在考证过程中有幸得到地方史专家朱封鳌、曹志天、陈远志、庞国斌、杨晓玉、张忠健、许昌渠先生以及兴教寺住持传慧法师、湖州赵孟頫研究会秘书长徐勇老师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单位：天台学工作室）

让地方党史成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教材

李 幸 斐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一百年历史，是一段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富裕强大的历史，这段历史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国的富强而英勇拼搏、废寝忘食、无私奉献，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成果都能在这段历史里找到共产党员奉献和创造的足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初心”，就蕴含了对于党的伟大历程的深沉回望；所以其言虽简，却十分地打动人心，我们的党员干部教育工作手段要追求“入脑入心，化为行动”，也就得充分运用好党史这本既具体丰富又生动形象的教材。

笔者认为，温岭市党史辉煌，有着众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蕴藏着巨大的“榜样的力量”，是党员干部教育的宝贵资源；努力发掘和发挥其

教育作用，让党史学习教育长效化，能有效推动党员教育工作的深化。

一、温岭党史中蕴含丰富的 思想教育资源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温岭人有着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精神。

中共温岭组织创建于1924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建了辉煌业绩，涌现出大量的烈士、英雄和先进人物。

红十三军二师以温岭为中心，为劳苦大众求公平，打恶霸，反掠夺，坚持了长达十年的革命斗争。经历了50余次的战斗，150多位革命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后全师解体。红二师这个英雄群体用党性、鲜血和生命演绎了大量的英雄故事。柳苦民、

潘心元、赵胜、程顺昌、赵裕平、程小林、应保寿、童一鸣等红军指战员，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光荣而又悲壮的革命斗争经历，都有着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温岭组织领导的“青年战时服务团”、“东南乡抗日宣传队”，国共合作时期的温岭抗日自卫委员会、温岭县战时政治工作队等为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全县掀起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也涌现了大批先进人物，如梁耀南、李先导、叶亮、赵任、王之景、包毅华、王国梁、王绍华、叶斐英、李安素、梁仪等。

解放战争时期，浙东浙南党组织、括苍游击支队先后在温岭开辟新区，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组织农会、民兵等群众组织，开展“三反六抗”斗争、打击恶霸地主、为人民军队筹粮筹款，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革命高潮，直至武装解放温岭。其中也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和许多先进的人物。

温岭党史上的这些先烈和先辈，有的穿梭于枪林弹雨，最后血染沙场；有的面对敌人的酷刑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有的为革命事业倾家荡产、呕心沥血，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革命先辈以汗水、鲜血和生命诠释的“初心”感天地、泣鬼神！蕴藏

着巨大的感召力，是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绝好资源。

（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温岭人有着敢争先进的精神。

为建设好温岭，温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敢争先进的精神，许多争先事迹可圈可点。为实现农业机械化，1956年，温岭县成立台州、温州地区第一个拖拉机站，有拖拉机53台。1957年，温岭县粮食生产达到亩产800斤，跃居全省第一位。1958年，国务院授予温岭县及城南照谷等四个生产大队为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称号。1973年，温岭县肖村公社金家大队农民自发取消农副业一本帐的做法，实行分地到户。1972年2月20日，江夏潮汐试验电站工程指挥部成立。1980年5月4日，江夏潮汐试验电站建成，一号机组启动正式并网发电。1985年，五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发电量3200千瓦，其规模在当时为全国第一，世界第三。

（三）改革开放时期温岭人有着敢闯敢冒精神。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温岭人在争先精神基础上做出许多敢闯敢冒的大事。1984年3月7日，温岭县养鸭专业户张天津受到王震、方毅、姚依林等中央领导的接见，3月18日，被授予“全国农村科技致富能手”称号。1983

年1月，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牧南工艺美术厂开业，这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1986年11月11日，温岭县以发行股票形式集资建设的藤岭隧道通过。2000年12月18日，经过7年修建、总投资1.4亿元、温黄平原金清水系三大治涝骨干工程之一的江夏排涝隧洞工程竣工。1999年5月14日，“钱江摩托”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台州第一股”。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温岭人有着回归初心精神。温岭近十年来在中共温岭市委的领导下，开展了三改一拆、九龙湖湿地公园的建设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等各项举措，温岭也变成更适合老百姓居住的美丽城市。温岭的交通在沿海高速、81省道改建、中央快速通道、疏港公路等一系列重点工程的完成后面貌发生巨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市博物馆、档案馆等项目建成投用，网通全球，特别是抗疫时期，共产党员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于是我们随处可看到传递不断的文明清风。

以上只是列举，其实中共温岭组织领导下的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更恢弘更壮阔，其留给后人的史料更丰富精彩。

二、党史资源教育化利用的欠缺状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成果是显著的。如2002年、2005年分别出版《红十三军二师烈士传》、《悲壮的历程》等书籍。2001年、2008年分别出版了《中共温岭党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温岭历史》第二卷。2009年至2014年出版发行了《温岭抗日战争纪实》，大型画册《峥嵘岁月》《走向辉煌》上下集等。

2011年温岭党史研究室又在全市范围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对全市30多个革命遗址进行了资料上的挖掘整理，成效显著。整合了散乱史料的同时，及时挽回了一些可能散失的史料；进一步推进全市革命遗址的发掘和宣传工作。

党史史籍的出版、革命遗址的修复开放，其作用当然不仅仅在于“存史”，它无疑也是教育后人的“教材”。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媒体事业和数字化的发展，党史的宣传教材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作为有意识的面向党员干部的“党史资源教育化利用”，仅有这一些是不够的。从这一特定角度审视，不足有两方面：

一是“教材”本身的不足。总体看，目前我们的“教材”立足于革命年代的角度看，局限在已经出版的党史书籍和已经修复开放的革命遗址两类。更加直观可感的图片、影视类产品，更加适宜于网上传播利用的产品，虽然丰富，但利用率不高。即便是已有的两类，也还很不足。如书籍主要的还是“事”的记载，深入到故事细节、人物内心的、生动可感的读物还很欠缺。如遗址，大多还只是非常粗略的“史事”的说明，有的甚至还仅仅是一个屋壳、一块题名碑。这样的遗址，能告诉人们的也就仅仅是知道历史上有这样一件事或这样一个人而已，很难产生多少教育的作用。而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媒体方面的成果还没有真正成为各单位信手拈来的党员干部学习教材，本文所说的不足，既包含了“教材数量的不足”，也包含既有教材“教育功能的不足”这两个方面。

二是利用的不足。利用不足总的说就是，利用党史资源开展党员教育还不普遍、不经常。其原因，一方面是主观上对利用党史资源开展教育的作用缺乏认识，因而不够注重利用。另一方面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亦即“教材”的上述问题；教材越多样越生动则越可利用、越吸引人利用，反之亦

相反。

要用党史资源的感召力去教育感化党员，让他们从党的历史长河里汲取营养，从而自觉做一个合格优秀的党员，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三、进一步发挥党史资源教育作用的建议

笔者建议，开展以革命先辈先进事迹为主要内容、以感化为目的党员学习教育活动。活动含“教材”建设（亦即党史教育功能的发掘）和教育活动组织领导两方面。组织开展好这些活动，笔者认为要做到下列几条：

（一）加强市委统一领导，在各级党委政府全面参与下开展工作

显然，本文所谓“教材”，只是从党员教育着眼的说法，其实它就是党史资源发掘保护工作及其作用深化的工作。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显然，我们努力发挥党史资源的党员教育作用，也正是对中央指示精神的切实贯彻和具体落实，是各级地方党组织的份内工作职责。

党史资源的“教材化”工作，牵涉到各级领导部门和各个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它必须在市委统一领导和

政府相关方面的全面参与下展开。

（二）加强党史教育资源的整合，系统设计“教材”

既有资源包括下列诸方面：1、各种革命遗址；2、市委党史研究室已经编辑出版的党史书籍，各部门、镇街道为宣传红色文化而制作的党史数字作品和书籍；3、温岭市博物馆的展出；4、民间的红色故物收藏馆、红色珍品收藏点（人）等。要认识到，因受研究发掘深度的限制，有些资源还是没被发现的，如上级档案、外地历史资料中存有的关于温岭市的党史资料或史实，还有市民间尚存的口头传说等等。

这个教材应该是体系化的。其具体类型丰富多样，包括遗址、书籍、展览场所、音像制品、网络产品等。其系统化体现在，具有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性，具备教育意义的多方面属性——如廉政、守纪律、心系百姓、坚持信仰、牺牲精神等等，各类型能相互补充和相互阐发——如遗址、遗物、人物故事的相互映照。

确定对象和类型的同时，要明确教材建设标准。然后按标准，有计划、限时间地进行打造。

（三）抓节点，抓联动，促推教育活动持续开展，不断深入

一要利用节点时机抓教育。如七

一、八一、十一以及温岭解放纪念日等，都是深入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的契机，要预先策划组织，充分筹备，加强宣传，力争教育效应最大化。要开展温岭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纪念宣传策划，追求内容和形式生动新颖，有吸引力、感召力。

二要强化整体协同抓教育。教育活动组织工作相关部门要紧密沟通，形成左右协同、上下联动的一盘棋，把党史学习教育与落实推进市委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的各个环节。

三要精心设计载体抓教育。要设计开展丰富多彩的、吸引广大党员共同参与的活动，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探索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促进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深入人心。如开展“我讲先辈故事”活动——即读党史讲故事活动，“我为先烈尽孝心”活动——即为革命遗址建设提供义务的脑力或体力劳动等。

通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庆祝党建党群系列活动，全市党员干部对党史学习教育的意义肯定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在学习内容、学习环节和学习形式上加以引导，让厚重的党史史料真正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学习教材。

（作者系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综合科科长）

论徐霞客、王士性对水资源的 勘察与保护

丁式贤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同年9月7日，习总书记又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生动形象表达了我们党

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笔者近期在学习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同时，重读了《徐霞客游记》和《王士性集》，发觉徐霞客和王士性，这两位明代杰出旅行家、地理学家，对生态环境、尤其是对水资源的勘察与保护，具有独到的见地，并将其贯穿在游记的字里行间，现作一简要的述评。

徐霞客对水资源考察与保护的 特殊贡献

通读《徐霞客游记》，尤其是

《游天台山日记》，更使人理解徐霞客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毕生相许山水，毫不夸张地说，徐霞客留下的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将血溶于水，可以说他的每一篇日记都离不开水，诸如《游天台山日记》中，对流水侵蚀地貌的描述，有涧、隘谷、溪、瀑布、壶穴等。

涧，属于V形河谷，天台山涧曲折，落差较大，间有瀑流、深潭。如桃源，涧随山转，人随涧行。“两旁山皆石骨，攒峦夹翠……涧穷路绝，一瀑从山坳泻下，势甚纵横”，“初由涧口入里许，得金桥潭。由此而上，两山逾束，翠碧穹崖，层累曲折，一溪介其中。溯之，三折而溪穷，瀑布数丈，由左崖泻溪中”。

瀑布，是在坚硬岩石的边缘或断裂线上，由于河流下蚀作用而造成的明显跌水现象。天台是多瀑山区，游记写到其中的石梁、铜壶、水珠帘、桃源、螺峰、百丈、三井诸瀑。铜壶是典型的多折瀑，“水瀑从石门泻下，旋转三曲；上层为断桥，两石斜合，水碎进石间，汇转入潭；中层两石对峙如门，水为门束，势甚怒；下层潭口颇阔，泻处如阙，水从坳中斜下，三级俱高数丈。和极神奇，宛转处为曲折遮，不能一望尽收。”其实第二层是“壶穴”，即水流涡动和下蚀作用所成的一种凹穴。这是一处腹大口小的

瓮形巨洞，瀑水由崖岸下跌，在穴中回旋奔涌，由前面一处裂口冲出。犹如古代计时工具“铜壶”之滴水，昼夜不息，故名“铜壶滴漏”。“溪回山谷，木石森丽，一转一奇，殊嫌所望”。他心里感到非常满足和欣慰。对石梁和断桥、珠帘的描述，尤为动人。“仰视石梁飞瀑，忽在天际，闻断桥、珠帘尤胜”；“越一岭，沿涧八九里，水瀑从石门泻下，旋转三曲”、“三级俱高数丈，各极神奇”、“又里许，为珠帘水，水倾下处甚平阔，其势散缓，滔滔汨汨。”此时，霞客竟兴奋得赤足跳入水中，沿着悬崖边玩边走。直到“暝色西下，始返。停足仙筏桥，观石梁卧虹，飞瀑喷雪，几不欲卧。”次日清晨，霞客顾不得吃早餐，即循仙筏桥上昙花亭，见石梁就在亭外。“梁阔尺余，长三丈，架两山坳间。两飞瀑从亭左来，至桥乃合流下坠，雷轰河溃，百丈不止。”此刻的他，心潮澎湃，不过险情，亲自“从梁上行，下顾瞰深潭，毛骨俱悚。梁尽，即为大石所隔，不能达前山，乃还。”后又一次“坐观石梁”。过了两天，当他游寒岩鹊桥时，又写下“亦可与方广石梁争奇，但少飞瀑直下耳”。时隔近20年后，霞客重上天台山，“过上方广寺，抵昙花亭，观石梁奇丽，若初识者。”此处用了“奇丽”一词，表达了他对石梁的厚意。并视“若初识”，说

明他百观不厌。

徐霞客还从宏观上分析天台的水系。在三次游台之后，他以三百字的篇幅归纳境内诸溪源流：或“由宁海而往于海”或“西北注于新昌”，而绝大多数溪流注入大溪（始丰溪）。条分缕析，如数家珍，与现代地理学关于天台诸水分属青溪、曹娥江和灵江水系的结论相符。

徐霞客在三游天台山后，不仅对天台山的诸多名胜古迹一一作了评述，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对水母溪、阙溪、螺溪、女梭溪、清溪、秀溪、福溪、罗木溪等的来龙去脉都进行了细考，这是笔者见到的所有游记、志书和天台山专记等前所未闻的，唯独徐霞客对此作了明确的记述，这是对天台山传统文化的独特贡献。不愧于后人对他伟大的旅游探险家、地理学家、地质学家的称誉。

徐霞客游天台山如此，游雁荡山亦是如此。尤其是第三次游雁荡山，他花了三天时间，终于考察清了大龙湫瀑布的源流。从而纠正了《大明一统志》的错误记载。陈函辉在《徐霞客墓志铭》中写道：“过十日而霞客来，言：‘吾已取涧道，扞萝上。上龙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再攀磴往，上数十里，正德间白云，云外两僧团瓢尚在。又复二十里许而立其巅，罡风逼人，有麋数百群，夜给

予宿。予三宿而始下山。’”陈函辉钦佩“其果敢直前如此”。正因为徐霞客有这种“果敢直前”、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在他后来的西南遐征中，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在云贵高原勘察探寻长江源头，终于写出了论文《溯江记源》和《江源考》。徐霞客在四川峨眉山下把这篇论文托人转展万里寄给时任靖江县令的陈函辉。陈函辉看后非常赞赏，当即决定收入《靖江县志》并寄给徐的故乡编入《江阴县志》，两志先后于崇祯十三、十四年（1641）正式出版。这也是徐霞客考察江河大川研究成果的著作首次被官家付梓印刊。徐霞客的《溯江记源》和《江源考》以“江源金沙说”，否定皇家权威著作《禹贡》的“岷山导江说”，因而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经康熙朝《皇舆全览图》的印证和学者杨椿的《江源记》的褒扬，才“身歿百余年，其盲始征信于圣世”。正因为此，才使陈函辉笔下的《徐霞客墓志铭》，写出了徐霞客以身相许山水的光辉一生。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弘扬民族文化遗产，《徐霞客游记》和“江源金沙说”，引起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关注。1958年1月28日和1959年4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二次讲话，都讲到了《徐霞客游记》和

“江源金沙说”。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是错误，他说金沙江导江，我看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我有这个志向，……我很想学徐霞客。”当时毛主席还打算步行游历黄河、长江。联想到将近半个世纪后，李先念主席给徐霞客的题词：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温家宝总理写的贺信，一开头就表明“心怀景慕”，并尊徐霞客为“先哲”。这对我们这些从事“徐学”的研究者来说，是多么的亲切，而又寄于由衷的厚望！

王士性对水利精心勘察的重大成果

笔者近些年在对徐霞客及与其同时代的浙江临海人王士性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他在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与徐霞客各有千秋；对水资源、特别是水利的精心勘察与保护，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士性在其代表作《五岳游草》和《广志绎》中有诸多记述。现择要引证之：

在《入天台山志》中他写道：“天台山北水二：石梁水流入剡，双溪水流入明。天封水东流过宁海注海，万年水西流出黄杜入剡，余皆会清溪而下灵江。”

据当代王士性研究专家周振鹤和徐建春俩考证，王士性著《五岳游草》《广志绎》，后者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比成书于崇祯五年（1632）的徐霞客《游天台山日记》（后）记述天台山“之溪”早35年。《五岳游草》还要早几年。徐霞客游天台山之时，应当经挚友临海人陈函辉举荐，读到了王士性的《五岳游草》和《广志绎》，王士性的《入天台山志》则成了徐霞客三游天台山的“导游图”，故而关于溪的记载如同一辙。而徐霞客记到北水流入新昌（即剡）时，还特地写明“亦余履未经者矣”。这很有可能是借鉴王士性的记载。

说到溪，王士性《五岳游草》中的《点苍山记》还有十八溪的记述：“峰头十八溪，自南至北。则有斜阳峰为南溪一，马耳峰为葶苈溪二，佛顶峰为莫残溪三，圣应峰为青碧溪四，马龙峰为龙溪五，玉马峰为绿玉溪六，龙泉峰为中溪七，中峰为桃溪八，观音峰为梅溪九，乐峰为隐仙溪十，雪人峰为双鸳溪十一，点峰为白石溪十二，三阳峰为灵泉溪十三，鹤云峰为锦溪十四，白云峰为芒涌溪十五，莲花峰为阳溪十六，五台峰为万花溪十七，苍崑峰为霞溪十八，云龙峰十九。”（即十九峰、十八溪）。这就是王士性当年云南游留下的惟妙惟肖的记

录，谓之为：“西南之所称最胜也”。点苍山十九峰，峰峰出泉水，泉水坠入深谷，飞珠倾泻，润泽寸土。泉水流至城中，从穷乡僻壤到通衢大道，家家户户流水环绕，因此王士性写道：“点苍山之下，烟火万灶，而且惠及于兹泉者薄矣，不独舟楫也”。这里算得上是“天下的奇景绝境”。正因为此，他于万历十八年（1590）调任云南副使时，次年十二月，带其长子王立毅游览著名的佛教圣地——鸡足山。并有《游鸡足山记》传世，而王立毅后来还与徐霞客结为好友。

这里要提及的是，王士性于万历十一年（1583）八月，由河南确山知县选礼科给事中期间，还有一个关于在黄、淮两河流经接近之处。（即徐州以下，淮安附近的桃源一带）恢复黄河故道，以解百万淮民水患之危的奏折，写得情理分明、心怀激荡。这篇题为《祖陵当护，运道可虞，淮民百万危在旦夕，乞复黄河故道，以图永利疏》的奏章，一开头就点出当时黄河在徐州以下的水患日甚一日，是当前国家最难治之事。他言及自己因家在坝方滨海地区，来往黄、淮二河已不止数十次了。而在日前又渡淮河去寻访淮阳父老时，一同探讨了水势之利害。于是，他坦陈在万历元年（1573）时于徐州还见到这里河水波涛滚滚，然而仅仅10年多一点的时

间，则已淤塞不波了。这是因为河床抬高了，人行河堤之上，与徐州城墙上行人的高度完全相等。面对河水一旦溃决，贻患可见的危局，从前的治河臣僚们是采取一道道地筑堤来进行防御的。虽然可以一时无患，殊不知约束愈紧，则河流愈快，直泻淮河，淮河不敌，而一待水退，泥沙就跟随堤坝而淤塞，故今天在邳州以下，堤高于地约一丈二三尺，在夏秋之涨时节，往往只差二三尺便淹到堤顶。也就是说水高于地有一丈之高。从前在这一带是黄、淮合流之地，而今是黄河强势，淮河萎缩而不敢合。一旦黄河水季，开启通济、天妃这些水闸，则黄河水便直捣运河，势如滚汤沸水，纵横肆虐于高邮、宝应之间。其后果首先是运河要道受到破坏，关系极大；其次，淮河萎缩，不敌黄河水势，只得退而浸渍泗洲，于是逼近而威胁明王朝之祖陵，其害甚巨；第三，黄河水至清河向南冲突有四折。奏折将河水冲刺四折之况详绘缕析，阐明前三折决口，不仅使运河航道瘫痪不说，而且殃及淮安、高邮、宝应、盐城、兴化的数百万民命，皆成鱼鳖；在范家口的第四折决口，虽对运河要道尚无大碍，但盐城、兴化的住民，亦难免鱼鳖之灾。民皆鱼鳖，岂能小视！以上三点，王士性谓之乃淮河及其众民面临的三大忧患。

这篇奏疏，计3300余字，是在他一再亲临察访，倾听了林林总总的意见之后，怀着一腔为民请命的情愫写成的。行文缕分条析，忆昔言今，利弊同陈，逻辑严密，情词恳切，而对臣僚中鼠目寸光之徒、谋私好利之辈，又不乏讨伐犀利之语，是他奏疏中又一上乘之作。

王士性这一份关于恢复黄河故道以防洪拯民于水火的奏章，后因朝廷总管治河的大臣和治河省臣声称王士性侵犯了行事的职责，给予百方阻止，而终于未能举行。事隔10年，在王士性从云南任期届满回到京师，又参政山东，行荒各地之后，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晋太仆寺少卿时，因黄、淮二河水灾频频，处于淮河之边的明王朝祖陵果真遭到冲击毁损，被朝廷遣官揭露，以致治河省臣受到削职戴罪查处。而朝廷掌管治河工程的大臣也才后悔当初不该不采用王士性的建策，于是不得不另派省臣前去履职视察，然后依照王士性早年所指恢复黄河一段故道，方使淮河流畅灾减。

王士性宦游天下，对江南、江北在土地、水利、气候、作物等方面的差异有深刻的认识，他总结道：“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强也。”此时同

僚徐贞明《潞水客谈》说要在京城郊外兴修水田，他因见到玉田、丰润二地之间有一二处水田，就以为京城郊外的大片土地都是如此，却不知道那是河流的源头，当地已经自发在那种植谷物了，何必别人去开发。王士性起初读到徐贞明在《潞水客谈》感到疑惑，还以为是书生的闲谈，不料后来有人竟一意孤行去做了。没有水的地方，就强迫百姓去开挖成塘堰，百姓在每一亩地里要花费原本十亩地的工夫。等到塘堰修好了，由于沙土很难蓄积水分，下雨太多就成涝，雨停后又干涸。在王士性看来，北方人习性懒散，不受监督，为这件事几乎出现了百姓动乱的苗头，幸好被参奏朝廷才停止了在京城郊外兴修水田这件事。王士性又听说沈大宇曾在直沽（今天津）入海口开垦上百顷农田，几年之后，被记入田册而准备征收赋税，但一个晚上便被海潮淹没得无影无踪了。王士性于是总结道：“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犹不可好于有为。”有学者认为，王士性这一观点，实际上已经接近人地关系理论中的适应论与生态论，具有超前性。

王士性入仕后的20余年游历实践中，对各地山山水水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中年著《五岳游草》，晚年撰著《广志绎》，记述了所到之地的所见、所闻、所尝、所感，尤其是对人

地关系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首先他更具体全面地阐述了人地关系的理论。例如他在对浙江地区进行区域调查与研究以后认为：“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志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馐，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直到现在，关于这一点，我们的认识也依然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可王士性早在四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认识到，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

因而，笔者再次呼吁，在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深入开展“徐学”研究的同时，要开展对王士性的研究。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建春教授，在《俯察大地——王士性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出于他20多年来研究王士性的坦诚忠言：“王士性是我国明代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充满人文关怀的大旅行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学者和循吏，他在地理学方面的杰

出贡献与他晚40年出生的徐霞客相比不相上下，在伯仲之间。只不过徐霞客的主要贡献在自然地理方面，而王士性的主要贡献是在人文地理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士性是我国古代人文地理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一座高峰，他在人文地理方面的观点和论述，都已经走到了当时世界的前列，只要我们读一读王士性的著作，就可知这样的评价应当不是溢美之词。”

笔者以为，徐建春教授这段话讲得很中肯，作为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我们应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在深入研究“徐学”的同时，加强对王士性的研究。作为台州市徐霞客研究会，更是责无旁贷。近年，我们已与临海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共同成立了王士性研究课题组。为王士性、徐霞客、陈函辉在巾子山上“小寒山”遗址树碑立像；为王士性墓地立碑；同时编印《王士性集》，提供有关单位和同仁研究参阅。笔者恳请全国各地的“徐学”研究同仁，能为王士性研究提供史料，撰写高质量的文稿，为推进王士性研究多加指导。

（作者系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学术委员、台州市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兼王士性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论王棻的修志思想

沈松平 包宛灵

摘要：王棻是清代后期方志理论的集大成者。其修志思想既承继了古代方志地理派的特点，又吸取了历史派思想的合理内核，还论及了修志人才的团队构成，修志思想相对较为全面、独到，在古代方志两大流派之外自创一派修志风格，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方志学术思想。

关键词：王 棻 修志思想 贵因不贵创 征文考献

王棻（1828~1899），字子庄，号耘轩，浙江省黄岩县城东柔桥村人，清末著名的经史学家、方志学家、教育家。同治六年（1867）举人，后两次会试落第，从此专以讲学、著述为务，一生未入仕途。他先后主讲处州（今浙江省丽水市）蓬城书院、黄岩九峰书院、江西经训书院及台州清猷、正学、文达、崇文等书院，除教书外，其主要精力倾注于著述和修志，著述之多，在台州首推第一。他在修志中投下的精力更大，自谓“棻于志书一事，颇费苦心，常恨见闻单浅，致乡先辈遗文轶事放失不

传，罪无可逭”^①。主纂《九峰山志》《光绪青田县志》《光绪黄岩县志》《黄岩志校议》《黄岩集》《光绪永嘉县志》《光绪仙居县志》《仙居集》《光绪太平续志》，校订《光绪杭州府志稿》，各志皆为清代方志中上乘之作。王棻早年曾是孙诒让父亲孙衣言在紫阳书院的弟子，依师承应属“宋学”或“理学”，但他治学讲究实事求是，不为门户所拘，其故弟子王舟瑶称“柔桥先生以朴学名，其说经实事求是，不分汉宋，其为文平正通达，不事雕琢，而尤拳拳于乡邦文献”^②。反映在修志方面，则无论是

戴震、孙星衍、洪亮吉为代表的方志地理派（或称纂辑派、考据派），还是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方志历史派（或称撰著派、文献派），王棻皆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方志两大流派的基础理论，自创一派，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成为清末方志理论的集大成者，并开了后世方志史地融合风气之先。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探讨王棻兼采地理、历史两派优长的修志思想。

一、承继古代方志地理派的特点

中国古代修志流派有历史（或称撰著派、文献派）、地理（或称纂辑派、考据派）之分。前者以章学诚、鲁一同为代表，肯定方志如古诸侯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强调以正史写法修志，重视当代文献和地方档案，重视志书的实用价值，缺点是长于体裁而短于考据（内容），不以征引见长，无形中削弱了志书的资料性；后者以戴震、孙星衍、洪亮吉为代表，把方志看作地理书，首重地理沿革，重视对资料的考证，强调言出有据，缺点是信载籍不信传闻，厚古薄今，忽略对当代文献的搜集，志书编修贵因不贵创，缺乏创新精神，经世致用功能不彰显。

王棻在方志起源、修志体例、纂

志风格等方面继承了古代方志地理派的特点。地理派认为方志的起源可追溯到古代的地理书，即司马光所说的方志导源于《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则认为方志起源于古代诸侯国史，《周官·外史》所言的“四方之志”就是古代诸侯国史。王棻则主张方志多源说，在他看来，《禹贡》所记，《周官》中小史、外史、诵训、大司徒、土训、司险、职方氏所掌，与后世方志内容相类似，因此方志既导源于《禹贡》，又源头于《周官》，是从历史书、地理书中汲取源泉，才逐步演化到今天的方志的^①。但是，王棻虽然主张方志多源说，他在对方志性质的认知上还是倾向于地理派，虽承认方志是史的支流，“郡邑志者，史之细”^②、“地志虽微，亦史之一体”^③，但更指出了史、志的差别，“志虽史之支流，而其体实与史异”^④，所以他反对章学诚套用史书的写法修志，“往尝读章实斋《文史通义》，其言修志之例详矣。然其大弊在欲仿史，此与扬子云拟经何异？且史之例不可仿也”^⑤。

在修志体例方面，王棻提出“贵因不贵创”的主张，“盖其体主因而而不主创，其义主述而不主作，其文主详而不主略，其事传信而不传疑”^⑥。因者，因沿；创者，创

新。“贵因不贵创”即指在前志规模、义例的基础上，补其未备，续其所无，正其讹误。前志苟有可采可因之处，皆当博采其长，为我所用。在中国3000多年的修志历史上，“贵因不贵创”的传统由来已久，但作为正式理论的提出，则迟至清代乾嘉之时的洪亮吉。王棻的“贵因不贵创”修志思想上承洪亮吉，又吸收了其他人的意见，理论上更趋完善、全面，加上他亲身参与广修群志，发挥“贵因不贵创”思想甚多，影响也较前人为大。

王棻自谓“自是（指司马迁作《史记》——笔者注）以来，历代史书因革不一，大抵援据旧文，略为损益，亦未尝自创义例也，况郡邑志者，史之细乎？棻尝阅章氏《文史通义》，其言修志义法详矣，然其所修诸志，体例亦复不一，此无他，修志之法必因旧志而损益之，未可拘泥成法故耳”^①，所修各志大多也确实做到了“一仍前志”。但王棻的因仍法，绝不是死板地因仍前志，“凡旧志所载诸事，不敢妄减一字，惟补其阙”，而是灵活地运用因仍前志，既尊重前人的著述，又不以某人成法为法，在足够重视前志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为我而今修志所用。考王棻所修诸志，重修县志者四：黄岩、青田、永嘉、仙居；续修县志者一：太平续

志；校订府志者一：杭州府志。其中太平、杭州二志可谓因沿的绝好成例，最能体现王棻“贵因不贵创”的修志思想。而重修四志中的青田志“似不必大为更张”^②，永嘉志“从汤志之法，稍加釐正”^③，亦是贵因之杰作。惟黄岩、仙居二志例外，不复因循一仍前志的老例。以《光绪太平续志》为例，该志成书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志为戚学标等纂、修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的《嘉庆太平县志》。王棻尝谓：“台州六县志书，以戚氏嘉庆太平志为最善”。^④故续修太平县志，“其义例当一循其旧”，所不同者，仅于艺文、金石“加详”而已^⑤。纵观该志，也确实贯彻了贵因思想。其因仍之法表现为：一是在体例上“具存其旧”。如地輿志、建置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无论名称、内容还是所辖子目，皆大体一致。又因“戚志艺文载文而不载诗”，今续志，“亦不宜增立诗编以自立异，惟于续志之外重辑《方城遗献后编》以续李氏成经之书，与新旧二志相辅而行”^⑥。二是在内容上“赅续其后”，为嘉庆之后之事。三是艺文、金石门类记载“尤加详”。前志艺文志“书目略标大旨，不载序文，今则每书序跋一一附入，庶览者虽未见其书而大旨已了然矣”^⑦。四是“略有变改”。“前志节孝入

人物，今从史例别为列女一门，而分孝、贞、烈、节为四类，而名媛附焉”^①。五是“复增考异、补遗、附录诸目”，“或以正旧志之失，或以拾前志之遗”^②，皆在杂志之中，为前志所无。

即使是不依前志，内容和体例与前志大相径庭的黄岩、仙居二志，也体现了王棻“贵因不贵创”的思想。王棻所修的黄岩、仙居二志，与太平、杭州、青田、永嘉四志相比，表现出更多的更张之法。但是，王棻的更张之道、损益之法，并非空穴来风，实渊源有自，皆有所本。他反对章学诚标新立异的修志义例，“会稽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其言修志之法详矣、美矣，然僭拟史书，倡为纪、表、图、书、传、略六体，乱杂无章，莫此为甚。近人修各省通志，或用此说，殊为谬整。今不敢从，恐蹈扬子云拟经之失耳”^③。因此，《光绪黄岩县志》虽迥异于前志即《乾隆黄岩县志》，却也是博采台郡历代前志义例的精华积淀而成，这可从《光绪黄岩县志》颇多因袭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考见其一斑。《嘉定赤城志》是台州地区现存最早的一部定型方志，在台州方志史上具有开山之功。该志分地理、公廨、秩官、版籍、财赋、吏役、军防、山水、寺观、祠庙、人物、

风土、冢墓、纪遗、辨误 15 门；而《光绪黄岩县志》则分地理、版籍、建置、职官、选举、人物、列女、艺文、风土、古迹、金石、杂志 12 门。篇目设置上相仿之处颇多，如均有地理、版籍、人物、风土诸门，而公廨之于建置，职官之于秩官，虽名异而实同。黄岩志诸门编纂体例，亦多采用赤城志例，如版籍“惟依陈笈窗赤城志例，凡户口、土田皆为之表，以便览观”，职官“仿赤城志例，用史汉法为之立表，分为四卷”，风土“旧志散入版籍，今从赤城志例，析出以寄移风易俗之心”，“诗文散附各门，赤城志例也”^④。即使是诗文无类可附者，别为《黄岩集》，与《黄岩志》相辅而行，亦是效仿林表民作《赤城集》，与《赤城志》相辅而行。

在纂志风格上，王棻也倾向于地理派的风格，强调了无一语不出于人，“修志之法，与修史同，一字一句皆不可无来历，故宜多征书籍以备参考”^⑤。志书援引必须一一注明出处，“棻谓撰志之法与作文异。作文者词必已出，不容剽袭。至于撰志，则一言一句皆当稽之群书，参以档册，不可挟私妄作，作乡壁虚造，以误后人也。若不注明出处，则妄私之见，得以参之矣”^⑥。同时，王棻也十分重视志书史实的考证与校订，提

出校订须“取省、府志与旧志校对，点篡改易，必有据依，不可一字一句妄作”^①。王棻所修各志，都非常重视对前志的勘误补遗，指出旧志内容的可疑之处，考证旧志的谬误，且每一处删改都做到有据可依，不为妄作。《光绪黄岩县志》卷四十设置了“辨误”门类。《光绪永嘉县志》也设置了“辨误”、“存疑”门类，将全书具有典型性的谬误或存疑独立成卷，每一条先陈述事实，后面紧接着注明资料出处，为后来撰志者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续修《光绪太平续志》时，又在“辨误”、“存疑”的基础上，新增了“考异”、“补遗”等门类，在对旧志内容考订时，能考证出来的加以纠正，如果碰到有疑问但没有确证的依旧按前志所载，不敢随意删改，“前志校刊未精，颇多讹字、俗字，今重为校刊，当悉心厘正。其有虽疑其非而未得确证者，姑仍其旧，不敢臆改，昭其慎也”^②。

二、吸取古代方志历史派思想的合理内核

但是另一方面，王棻的修志思想又不照搬方志地理派的观点，同时也吸取了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方志历史派思想的合理内核，如强调志书的实用价值，重视当代文献的搜罗等等。自

南宋郑兴裔首先提出方志具有存史、资治（资政）、教化三大功能以来，后世古代对方志功能的探讨，基本没有超出郑兴裔所论述的范围。只是以戴震、孙星衍、洪亮吉为代表的地理派，因缺乏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而使所修志书的经世功能未得到彰显，而历史派则更重视志书的实用价值，强调志书经世致用。王棻强调了方志的存史功能，认为方志的作用首在征文考献，为国史取材，补史之缺，“志本为征文考献”^③。他说：“夫取数百年之文献而聚之一书者，史也；取数百里之文献而聚于一书者，志也；取数十世之文献而聚之一书者，谱也。谱之文献，修志者之所资；志之文献，作史者之所资；史之文献，则天下后世学古者之所资也。国之文献不足，虽良史如马、班，不能尽其才；家之文献不足，虽善谱如欧、苏，无所用其力。其重也若彼，其难也如此”。^④除了方志的存史功能，王棻也非常看重方志的资政功能。他认为官员上任之始若通过志书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社会状况、经济情况等，便于后期工作的开展，可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故其所修各志，始终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如他在《光绪太平续志》中《蓝田胡闻基田形图》的小序中提到：“今闸及港已告成矣。其两岸余地本为挑浚置泥，经通详在案，不得租

人造房。特恐日久被侵，爰照旧时田形分图五页，俾后之人得以按图管理焉”。^[1]在编纂《光绪黄岩县志》“水利”目时也提出：“国以养民为经，而农田以水利为重，河渠、沟洫，史之所以志也”。^[2]

地理派信载籍不信传闻，厚古薄今，不重视当代文献。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则针锋相对，尤重视当代文献的搜集。王棻无疑也承袭了历史派的这一主张，其所修各志均以“征文考献”为重，“第以志乘之书，首重文献，而文者尤献之所恃以传者。文苟不足，献于何征，故纂辑之初，当以征文为重”^[3]。在王棻看来，一般情况下，续修或重修志书，主要是为了及时记录“人物、艺文”，保存当代文献。“义例当一循其旧”的《光绪太平续志》以略建置，详人物、艺文为其贵因原则。而体例大相径庭的《光绪黄岩县志》则因前志“凡沿革、山川、古迹、风土俱未详审，至于文献所系，放失尤多”，可因可沿的地方不多，故改弦易张，“今之所纂，一以征文考献为重，而凡旧志所未详者，亦皆重加釐订，不敢因陋就简，以贻苟且之讥”^[4]。由此可见，王棻的大不因沿前志，是别有衷心所在，“盖其体虽稍异于古人地志之书，其用实足以系一邦文献之大”^[5]。这里提出了一个“体”、“用”关系问

题。“体”乃志书编纂之体，“用”乃“体”之内容，按王棻的话说就是“征文考献”，实是修志诸家的第一要务。王棻的“贵因不贵创”思想，其实质是着眼于志书的“用”，从“用”的标准出发来衡量“体”。“体”可载“用”，虽一仍前志，可也；“体”苟不能承载“用”，此“体”则必然被打破，虽自创一体，“异于古人”，亦无所顾忌。

王棻强调通过采访搜罗当代文献。他说：“修志之法，首在征文，文足而献自足；次在校订……又其次在采访，邑献遗书、荒村断碣、官府档册、民间谱牒，靡不征求，以备采择，然后依次编录”。^[6]如何才能做到呢？他指出，一是要配备一定数量的采访员，“采访之人不厌其多。每乡每都各有分司，城中则择二人以总其事”^[7]；二是乡人私人所藏文献务必要搜尽，“凡有乡先辈遗书，不论已刻、未刻，清本、草本，均宜送局以备采择。至于轶事遗闻，乡里相传不知真假确者，亦可送局备查”^[8]；三是志成后要给予采访员列名和报酬，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他日志成，其姓名皆得列于首卷，亦足以酬其劳矣”^[9]。

三、修志须有“当事者”的支持和必要的人才团队

除了兼采方志地理派、历史派两派的优长外，王棻的修志思想还体现在对修志人才的要求上。刘知几认为修史之人，必须要具备史才、史学、史识，章学诚在其上又加了一个“史德”，认为无论修史、修志，必须具备“史德”，但以上要求，仅着眼于要求修志人才个体的优异。而王棻则率先论及了修志人才的团队构成，在王棻看来，所谓修志得人并不是指个人的素质优异，而是指团队的素质优异。王棻认为，要编好一部志书，需要一个修志团队，不仅总纂须得人，而且，协修之人、采访之人、总理之人、缮写之人、校正之人、校刻之人也都必须得人^[4]。由他们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才能很好地完成志书的编纂。不仅如此，王棻甚至还提到了地方行政长官在修志中的重要性，认为志书是否能修成，还取决于志书的主修者即地方行政长官的意志，“然则书之成否，实由当事者之志耳。今太守湘乡成公既有志于是（指光绪十三年，时任台州知府成邦干提议续修《台州府志》，邀王棻参与，但不久因成氏离任，事遂告辍——笔者注），而不汲汲于簿书期会之间，盖与齐、陈二公（指《嘉定赤城志》修成时的台州知州齐硕和主编陈耆卿——笔者注）相望于数百年之内也。棻虽不才，敢不竭其愚虑以报公命”

^[4]。此言道出了官修志书的基本特点，一部志书是否修得好，首要的条件是“当事者”即地方行政长官对修志和修志人员的支持，其次才是志书具体编纂人员的选用。

四、结语

清乾嘉中期正式形成方志历史、地理两大流派之后，发展至民国三十年代，在当时史、地已分科治学的历史大背景下，历史、地理两派开始呈现融合趋势。如民国方志学者黎锦熙提出“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方志是“地志之历史化”和“历史之地志化”。^[4]庄为玘也说：“窃维方志之为物，所以济史地之穷。目下科学日进，史地遂以分家，实则史载已往，地释现在，史探其原，观其变，地穷其分布，索其联系，方志虽仅记一区域，然欲明其真象，舍地理为基础、历史为附丽之方志外，实难窥其全豹也。故曰：新方志者乃合来原、演变、分布、联系为一之科学，非如昔日附庸于历史之书也”。^[5]而王棻早在清末，就兼采了方志地理、历史两派的优长从事修志活动，实开后世方志史地融合风气之先。其修志思想也相对较为全面、独到，自创一派修志风格，并通过师生、好友、血缘等关系得以传承、延续，形成了一个

台州方志学者群体，如王棻的修志思想通过喻长霖（注：喻长霖既是王棻的学生，又是他外甥）编修《民国台州府志》得以延续，终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一股清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方志学术思想。

参考文献：

[1] [清]王棻.柔桥文钞[M].上海：国光书局，1914.

[2] [清]陈汝霖修.王棻等纂.光绪太平续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50[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68.

[3] [清]陈钟英等修.王棻，王咏霓纂.光绪黄岩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51[M].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76.

[4] 黎锦熙，甘鹏云.方志学两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4:21-22.

[5] 庄为玘.方志研究刍议[M].1936:附5.

第一作者简介：

沈松平（1969——），男，浙江省平湖市人，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地方志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浙江省地方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浙江省地方志专家委员会委员

第二作者简介：

包宛灵（2000——），女，浙江省三门县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方志学专业2018级本科生

（上接第64页）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汇报交流了市本级党史部门推进市区一体化数字党史智慧服务平台建设的总体构想、工作进度和下步工作计划。随后，与会人员就加快推进党史智慧服务平台建设开展了深入讨论，大家从云数据库建构、多样化场景布局、整体智治谋划、协同高效要求等多方面进行了交流。市委改革办数字化改革专班负责人高度肯定全市党史系统推进数字化改革的探索实践，同时从专业的角度提出

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建议。

室副主任刘东生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党史系统干部要增强变革意识，提升变革能力，主动拥抱改革、融入改革、服务改革，要以问题为导向，深度谋划多跨协同应用场景，加快推进数字党史智慧服务平台建设，不断为党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台州召开全市党史三卷编写工作推进会暨业务培训会

为加快推进全市党史三卷编写工作，5月18日，台州召开全市党史三卷编写工作推进会暨业务培训会。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王祖强应邀开展业务培训。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国超、副主任许宏志，各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及全市党史三卷编写业务骨干共计4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王主任围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精神，扎实推进地方党史三卷编写，从有层次地学、有比较地学、有目的地学三方面入手，重点而细致地阐述了地方党史三卷的编写要点、资料运用、推进原则、工作要求等。会上还开展互动交流，王主任就三卷编写中遇到的一些具体困难和问题，逐一进行详尽而生动的解答。

吴国超最后强调全市党史干部要深入消化吸收此次会议的内容和精神，将其转化为推进党史三卷编写工作的信心和动力。要坚持高站位，加快工作进度；注重高质量，打造精品力作；突出高标准，健全工作机制，全力推进全市党史三卷编写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创全市党史工作新局面。

（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促进会到台州调研 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开发工作

6月22日至24日，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促进会副会长李良福带队调研组来到台州，就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开发工作和贯彻落实国发〔2021〕3号及浙政发〔2021〕23号文件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国超等陪同调研。

调研中，调研组组织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会上，李良福细致听取了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以及椒江、黄岩党史部门近年来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开发和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工作的开展情况汇报，特别是各个系统实际工作中涌现的亮点、取得的成效、面临的问题及下步工作思路。与会对象还专门就推进红色资源内涵挖掘、创新红色资源宣教方式、加大红色设施保护力度、加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老区乡村振兴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李良福充分肯定了台州各地各部门近年来在推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开发和

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工作上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认为座谈交流中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建议，调研收获很大。李良福要求，台州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用心用力保护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做强红色文化品牌，要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凝聚工作合力，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加快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调研期间，李良福一行还调研考察了浙东浙南部队会师纪念馆、潘心元烈士墓和中共浙南第二次代表大会（1928年11月）旧址。

（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

——温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题展

荣获浙江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特别奖

由中共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岭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委员会共同主办，温岭市博物馆承办的“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题展”荣获由浙江省文物局组织开展的第十六届（2021年度）全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六个特别奖之一。

本次展览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创到繁荣，温岭城市的岁月变迁，以及温岭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主题，既回顾历史，也聚焦当下，构建起“红色记忆”“曲折前行”“改革开放”“继往开来”四个部分，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

产党带领温岭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光辉历程、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生动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本次展览主题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旨在通过这些具有革命性、代表性的史实和展品，引导人们学习党的历史、感悟党的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赓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展览共吸引观众近7.8万人次，共接待团队超150批次，成为了社会各界开展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

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 推动党史数字化改革工作

5月20日，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数字化改革工作推进会，研究推动市区一体化数字党史智慧服务平台建设工作。会议由室副主任刘东生主持，各处室负责人参加会议，市委改革办数字化

改革专班负责人、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受邀列席会议。

会上，组织学习了黄岩区推进“五维一体”数字化党史学教多跨应用场景的具体做法和有益经验。（下转第61页）